

## “依法”執行？－死刑在中國

### 目 錄

導言	1
資料來源注釋	4
1. 有關死刑的國際標準	4
2. 死刑在中國的適用範圍	6
2.1 中國免受死刑人員的範疇	6
2.2 犯下“最嚴重”罪行	7
2.3 死罪的数量	9
3. 刑事司法程式中導致侵犯人權的失誤	10
3.1 拘押期間的酷刑與虐待	9
3.2 使用戒具是酷刑和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14
3.3 超期拘押與單獨監禁	14
3.4 法律代表	18
3.5 正式逮捕與審判準備	21
4. 一審	25
4.1 政治干預	27
4.2 無罪推定	26
5. 上訴	27
5.1 上訴中修改判決	28
5.2 上訴法院下令修改判決或案件重審	28
6. 最高人民法院對死刑的審核和批准	32
7. 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終“審判監督”	38
8. 死刑的執行	39
8.1 槍決	406
8.2 注射死刑	38
9. 器官收用	451
結論和建議	47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依法”執行？——死刑在中國

### 導言

本報告描述在中國的刑事司法體制下，被懷疑犯有死刑罪的人從被拘留到被執行死刑的全過程。文中引用了國際特赦組織調研的案例，另還將使用一些中國官方媒體登載的案例材料。

讀者可以從報告中看到，侵犯人權的可能性潛伏在最終通向死刑的刑事司法程式的每一個環節中。舉例而言，嫌疑人在被拘留後應有權立即同自己的律師取得聯繫，且此後應得到充分的時間為辯護做準備。然而這樣的權利卻常常遭到拒絕；嫌疑人始終會有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種種形式的虐待，目的是逼迫其作出可用於庭審證據的認罪供詞；可能在法庭聽審之前，內部委員會就已經作出了判決和量刑；被告在庭審過程中無權質詢控方證人，而庭審往往是不公開的；上訴法庭關起門來，在對案件草草審核後就駁回上訴請求。然後，被定罪人就將接受極端殘忍的、非人道的待遇——執行死刑，剝奪其生命權。

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SOC)《關於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實施條款》(1989/64)第 5 條敦促各成員國公佈……關於實施死刑的資訊，包括判決死刑的人數，實際執行人數，(以及)處於死刑判決中的人數……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第 5 款規定：應公開宣佈執行死刑判決……

儘管在已獲得國際接受的國際文書中，要求仍然使用死刑的國家公佈其實施死刑的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堅持把有關死刑方面的統計數字作為“國家機密”。

因此，每年中國政府執行死刑的數字到底是多少，現在依然不得而知。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國際特赦組織每年都發佈一份已報導的中國死刑判決和執行情況的目錄，所使用資料主要來源於媒體報導。例如，該組織在 2002 年檢索到中國執行死刑的報導有 1060 條。然而，實際執行的數目還要高出許多。在中國，實際判決和執行的死刑中僅有一小部分被公開報導，而相關部門對透露資訊的範圍和詳細程度，每年都很不一樣。因此，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所反映出的主要是報導的程度，而不是潛藏於此之下的趨勢。

---

## 2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下面這個例子可以部分說明報導和現實間的落差：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監測結果，2002 年在雲南省有 17 人被執行死刑。然而在 2003 年 3 月，中國官方媒體報導，雲南省置辦了 18 個流動刑場——死刑注射車，每輛車的採購和改裝費為 50 萬人民幣（6 萬美元）。<sup>1</sup> 每年 17 人的死刑執行量顯然不足以使政府投資建立起一支由 18 輛車組成的行刑車隊。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一份內部檔估計，在 1997-2001 四年間，共有 60000 人被執行死刑。儘管這個資料中包含了死刑判決外的額外死亡人數，比如員警在追捕行動中造成的死亡，但平均每年死亡數達 15000 人。<sup>2</sup> 如果該情況屬實，則意味著中國政府每年在每 86000 人中就會處決或殺害一個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中國在 2002 年執行了 1060 個死刑，這一數位已經比世界其他地區有記錄可查的死刑執行數量的總和還要高得多。但是如果實際數字接近每年 15000 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這個有著世界上最龐大人口的國家，處死本國公民的數量占其人口之比例高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唯一的例外是位列世界上人口最少國家的新加坡。<sup>3</sup>

西南政法大學校長、重慶直轄市全國人大代表陳仲鄰（音譯）在 2004 年 3 月 15 日說，中國每年處決“近一萬人”。當這一數位被報導到國內外的媒體上時，他很快澄清說，這僅是個估計數位，其根據是學者和高層立法者所制的統計表格，並不代表官方數字。<sup>4</sup>

陳的估計數字是在高層官員發表講話表示有必要減少中國死刑數量後公開的。然而，如果那番關於減少死刑數量的表態是認真的話，中國政府理應定期公佈死刑使用情況的全部統計資訊。

與大量使用死刑相關的另一個令國際特赦組織關注的焦點是，中國刑事司法體制的不完善。中國公安、檢察、法院部門的行為一以貫之地不遵守國際人權標準。不僅如此，刑事司法系統中的官員們亦一貫藐視中國自己規定的法定程式，而官方在全國和地方範圍進行的“嚴打”運動鼓勵並助長了他們的做法。權力下放的法律管理體系使這些機關的權力大大超出自身的許可權，這更加劇了業已存在的嚴重問題，也使嚴重的失誤更容易出現。

---

<sup>1</sup> “死亡，雲南的風格”，《今日北京》2003 年 3 月 7 日

<sup>2</sup> 《中國的新統治者—秘密檔案》，安德魯·南森和布魯斯·吉利，格蘭塔書局（Granta books），倫敦 2003，第 191 頁。

<sup>3</sup> 聯合國資料顯示，新加坡在 1994 至 1999 年共處決 285 人。鑒於新加坡人口為三百五十萬，其比率為每年每一百萬人中有 13.57 人被處決（聯合國檔 E/CN15/2001/10 號）。基於同樣的標準計算，中國在 1997-2001 年期間，每年估計執行死刑 15000 起。在其人口為 13 億的基數下，中國每年每一百萬人中有 11.54 人被處決。

<sup>4</sup> “中國一年處決一萬人：全國人大代表” 法新社 2004 年 3 月 15 日

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嚴打”運動為逐年攀升的死刑執行人數提供了環境。目前這一輪的全國“嚴打”運動始於 2001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公安管理委員會主任羅幹敦促公安機關在持續的公安工作中“……堅持貫徹‘嚴打’方針”。<sup>5</sup> 在 2003 年 7 月 18 日，他還號召將這場運動再持續一年<sup>6</sup>，不過還不能確定是否因此而制定出實際政策，以便在全國範圍內把這場運動繼續下去。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 2003 年 12 月也要求把這場運動持續進行下去，以抑制中國持續上升的犯罪率。<sup>7</sup>

“一切法律认为是严重的罪行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一切法律认为应当受到死

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任书记，（《法制日报》，1996 年 5 月 4 日），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

根據官方統計，從 1998 到 2002 的五年間定罪率高達 99.1%<sup>8</sup>。從本報告所顯示的種種因素來看，這一“完美”數字實在是令人深感不安，這些因素包括日益增加的羈押和逮捕案例、刑訊逼供、限制獲得律師代理、無罪推定原則的缺失、“嚴打”期間，公安、檢察和法院在壓力下必須確保定罪、法院也會出於一種政治責任感作出有罪的判決，其目的是維持打擊犯罪的決心，而忽略了審判的嚴肅性。在這種情形下，錯判、誤判在所難免，甚至可能每天都有人被“錯誤”處決。<sup>9</sup>

國際特赦組織反對死刑，理由是：死刑是最殘忍、最不人道、最降低人格的刑罰，它侵犯了生命權。作為阻止犯罪的一項獨特手段，死刑的效用到底有多大從來沒有得到證明。<sup>10</sup> 隨著中國犯罪率的逐年攀升，我們不能再忽視這個問題——死刑與犯罪的控制和預防是無關的。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從本國的刑罰範圍內取消了死刑，死刑猙獰的面目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看清。國際特赦組織指出，死刑是對生命權的侵犯，而生命權是《世界人權宣言》和許許多多其他國際人權條約明言要保護的權利。這些均構成了廢止死刑的基礎。

<sup>5</sup> “羅幹在廣西省視察中強調‘嚴打’運動”，新華社 2003 年 4 月 15 日（BBC Mon ASI AsPol ron）

<sup>6</sup> “羅幹敦促繼續中國的‘嚴打’運動”，新華社 2003 年 7 月 18 日（BBC Mon ASI AsPol tbj）

<sup>7</sup> “中國聲稱犯罪率上升，呼籲繼續‘嚴打’運動”，法新社 2003 年 12 月 15 日

<sup>8</sup> 最高人民法院報告中指出，1998 年至 2002 年間有 3,222,000 人在一審(即上訴前)被定罪，僅有 26,521 人(或 0.9%)後被證明無罪。該報告未提供任何資料說明上訴的成功率或失敗率。可在 2003 年 3 月 11 日的 [www.court.gov.cn](http://www.court.gov.cn) 查詢(中文)《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sup>9</sup> 理應注意的是，國際特赦組織從未聽到任何官員承認過在中國現行司法中有人被“錯誤”處決。

<sup>10</sup> 見《死刑—全球綜述》（第三版），羅傑·胡德，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208-232 頁

---

## 4 “依法”执行? - 死刑在中国

---

為實現這一目標，也有鑒於本文所描述的、中國的公、檢、法機構在處理極刑過程中存在的嚴重體制性弊端，國際特赦組織敦請中國政府立即中止適用死刑。

### 資料來源注釋

本文列舉了一些中國媒體報導的濫用職權和錯判、誤判的實例，其目的是展現這些問題的“冰山一角”，並將其告知世界上更廣泛的讀者。這些案例還會得到國際特赦組織自己研究的有關侵犯人權實例的進一步證明。此外，我們還引用了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發表的研究成果。本文中還有一小部分資料來源於秘密渠道，為保護資料提供者起見，恕不提供其具體出處。

### 1· 有關死刑的國際標準

國際社會就死刑問題通過了許多標準。

1977 年，聯合國大會認為“……死刑問題方面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逐漸限制可處死刑罪行的數目，以期達到廢止死刑的目標。”（1977 年 12 月 8 日第 32/61 號決議）

1976 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開始生效。其第 6 條規定：

- 1· 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 2· 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
- 3· 茲瞭解：在剝奪生命構成滅絕種族罪時，本條中任何部分並不准許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以任何方式克減它在《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規定下所承擔的任何義務。
- 4· 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和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
- 5· 對 18 歲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處死刑；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
- 6· 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還有其他一些條款與死刑有關，包括保護公正審判權利的第 14 條。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即負責監督《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實施的專門機構，於 1982 年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作出權威性解釋：死刑應是“……一種相當特例性的措施”，同時“……一切用以廢止死刑的措施都應被視為享受生命權的進步”。

1984 年，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通過了《關於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下稱“經社理事會《保障措施》”）。這些措施規定，死刑的範圍“……只限於導致他人死亡或其他造成極嚴重後果的故意犯罪”。而且，任何導致死刑執行的法律程式“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確保審判的公正，至少要不低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規定的保障。”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稍後的決議中，敦促各國公開所有與死刑有關的資訊（1989 年 5 月 24 日 1989/64 號決議），並要求各國在死刑案件中遵守聯合國的其他人權標準，如《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1989 年 5 月 24 日 1996/15 號決議）。

1990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開始生效。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一樣，《兒童權利公約》禁止對未成年犯罪人，即犯罪時未滿 18 周歲者，適用死刑。

國際條約對締約國具有約束力。在批准了國際人權保護條約，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後，中國政府就已正式承諾遵守條約的規定。然而，2003 年 1 月，在中國江蘇省發生的處決未成年犯事件，則明顯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對中國規定的義務。

在條約上簽字，表明有意在稍後的時候批准該條約，成為該條約的締約國。當中國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字時，就表明中國有意要批准該條約。儘管目前中國還未正式受該條約的約束，但應當假定中國會遵守該待其批准的條約的主要規定。根據國際法，一旦一個國家簽署了一項條約，該國就不應作出任何違反該條約“目標和宗旨”的行為。

除了人權條約外，聯合國還通過了眾多設立保護人權標準的決議。儘管其並不具有國際法規定的正式約束力，但這些“軟法律”不應被僅僅視為是各國政府可以隨意遵守或忽視的建議。許多這樣的決議沒有經過表決就得到通過，這強烈表明了各國政府具有遵守其規定的一致意向。因此，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於 1984 年通過的《保障措施》在聯大會議上未經表決就以決議的形式獲得通過。其後，聯合國經社理事會 1989 和 1996 年的決議也均未經表決即獲得通過。

## 2. 死刑在中國的適用範圍

---

6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 2.1 中國免受死刑人員的範疇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5) 條規定：對 18 歲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處死刑；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

《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a) 條規定：對未滿 18 歲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保障措施》執行條款中建議……各成員國應採取措施執行《保障措施》，並在適當的時候，以下列方式進一步加強保護面臨死刑者的權利：

……

(C) 建立年齡上限，在此年限之上的人員不應被判處或執行死刑。

199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49 條規定懷孕期間的婦女和實施犯罪行為時未成年者（未滿 18 周歲者）免於判處死刑。

國際特赦組織尚未收集到任何對懷孕期間的婦女處以死刑的案例。2003 年 10 月，有報導說，一個被認定參與了謀殺其繼子的婦女被判終生監禁而非死刑，原因是她在審判期間正懷孕。<sup>11</sup> 最高法院規定，如果婦女在等待死刑判決的羈押期間流產，也不能在其後被判處死刑。<sup>12</sup>

國際特赦組織監測到一則報導：2003 年 1 月，一名 18 歲男子趙林因謀殺罪而被執行死刑，而該指控罪行是其在 16 歲時所犯。根據媒體對這一案件的報導，公安和司法部門瞭解趙林在犯罪時未成年，但他依舊被處決。<sup>13</sup> 這明顯違反了中國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應盡的義務。

中國在 1992 年 4 月 1 日批准加入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1996 年 5 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表達了這樣的擔憂：在中國，“……國家立法似乎允許對 16-18 周歲的未成年人處以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該委員會建議審核中國的立法措施，以確保其遵守《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的規定，即禁止對 18 周歲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處

---

<sup>11</sup> “繼母買凶肢解繼子 因懷孕不適用死刑被判無期” 《南方日報》，參閱（中文）網站：[www.nanfangdaily.com.cn](http://www.nanfangdaily.com.cn) 2003 年 10 月 11 日。

<sup>12</sup>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參閱（中文）網站：[www.court.gov.cn](http://www.court.gov.cn) 1998 年 8 月 4 日。附注：該批復是答復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的問題，想必該法院有相關案件待決。

<sup>13</sup> “年輕死囚絕筆警世人”，《河北法制報》，2003 年 3 月 12 日，也可參閱（中文）網站：[www.qsnvf.org](http://www.qsnvf.org) 2003 年 1 月 20 日

以死刑。<sup>14</sup>

1997 年 10 月，新修訂的《刑法》在中國生效。這部新法律最終廢除了對未滿 18 周歲的犯罪人處以死刑的做法。然而，1997 年以來的報導表明，依舊有在犯罪時未滿 18 周歲的人被處以死刑，因為法院對確定其年齡無足夠的關注。<sup>15</sup>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死刑的適用沒有年齡上限。2002 年 12 月，韋有德因為財產糾紛謀殺鄰居在湖南被處以死刑。據報導，當時他已近 90 歲。<sup>16</sup>

1997 年《刑法》第 18 條規定，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如處在精神病態中，應免除刑事責任，或減輕量刑。然而，在 1994 年郭陪龍謀殺父母一案中，儘管精神科醫生的診斷表明他在犯罪時患有精神疾病，但他仍於 2000 年 7 月 20 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sup>17</sup>

《刑法》第 48 條規定，如果“沒有必要立即執行死刑”，死刑可延緩兩年執行。然而，中國的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表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緩期執行比立即執行更恰當。國際特赦組織瞭解，在一些案件中，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在上訴或等待執行期間，因為有“立功表現”而被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許多所謂的“立功表現”是提供資訊，幫助抓獲其他罪犯並判定被告發人有罪。

有一點頗為引人注目並在本報告中有案例證實，即在事實不明朗或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上訴法庭很少修改死刑判決，而經常是將判決簡單地改為死刑緩期執行。因此，在死緩犯人中的錯判、誤判現象也屢見不鮮。

中國官方代表聲稱，死刑緩期執行多減刑為無期徒刑。但尚未有任何公佈的相關資料可證實此說法。根據《刑法》第 48 條規定，被判死刑緩期执行的罪犯在緩期期間“如被證實有蓄意犯罪行為”仍可被處以死刑。

## 2.2 犯下“最嚴重”罪行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2）條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罪行的懲罰。**

<sup>14</sup> 聯合國檔 CRC/C/15/Add.56 號，第 21、42 段。

<sup>15</sup> 關於對青少年罪犯施以死刑之全球性問題的全面報導，參閱：“停止處決兒童！廢止針對兒童罪犯的死刑”，國際特赦組織 2004 年 1 月 21 日（AI Index: ACT 50/001/2004）

<sup>16</sup> “本報記者採訪中國年齡最大的死刑犯”《北京法制日報》，2002 年 12 月 16 日（中文）

<sup>17</sup>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 年死刑狀況”，國際特赦組織 2002 年 9 月（AI Index: ASA 17/032/2002）



---

8 “依法” 执行? - 死刑在中国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的一般性建議第 7 條規定：委員會認為必須對“最嚴重的犯罪”一詞加以限制性的理解，即應把死刑當做一種相當例外的刑罰來使用。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通過的《關於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1984/50）第 1 條規定：在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只有犯下最嚴重的罪行才能判以死刑，應當瞭解，此類罪行的範圍只限於導致他人死亡或其他造成極嚴重後果的故意犯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7 年《刑法》第 48 條規定：“只有對犯下極其嚴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才能判處死刑。”該規定在多份關於限制判處死刑的國際文書中均有提及，包括以上引述。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認定許多犯罪類型或特定犯罪行為不屬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2 款規定的“最嚴重的犯罪”之範疇，其中包括“搶劫”和“不造成生命損害的犯罪”。<sup>18</sup> 中國刑法第 264 條規定盜竊是死罪，中國法律還規定多項“情節嚴重”的暴力犯罪為死罪，這裏“情節嚴重”並不僅僅指生命受到損害。而且，中國最權威的死刑專家和評論家之一，北京人民大學教授趙秉志指出，中國刑法中規定的死罪有 69%是非暴力性的。<sup>19</sup>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已特別指明“……判處經濟犯罪死刑是違反本《公約》的”<sup>20</sup>。然而根據中國刑法，諸如偷稅（第 205、206 條）；製造假幣（第 170 條）；盜用國家財物（第 382 條）；行賄受賄（第 383 條）；非法境外走私（第 151 條）；介紹賣淫嫖娼（第 240 條）以及殺害大熊貓等罪行仍可能被判處死刑。<sup>21</sup>

此外，委員會認為對有可能被處以死刑的行為，其法律定義極其含糊不清，且不符合《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2 款的規定。<sup>22</sup> 委員會已對“政治性質犯罪”的寬廣定義再三予以關注，該詞含義之廣導致死刑的判決有可能根據主觀性標準作出，而不是根據“最嚴重的犯罪”的規定作出。<sup>23</sup> 根據中國法律，一些犯罪行為，包括用詞模糊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諸如“分裂國家”或“破壞國家統一”（第 103 條），以及“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收買、非法提供國家機密或

---

<sup>18</sup> CCPR/c/79/Add.25 (1993)文件

<sup>19</sup> 《從中國死刑政策看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廢止問題》，趙秉志教授，中文版在 2003 年 7 月 18 日的 [www.icrb.com](http://www.icrb.com)。

<sup>20</sup> CCPR/c.79/Add.1(1992)文件，第 5 段。

<sup>21</sup> 最高人民法院於 1987 年 7 月 24 日發佈通告，對殺死大熊貓，並販賣其皮毛的犯罪分子判處 10 年監禁到死刑。

<sup>22</sup> CCPR/CO/75/VNM 文件，2002 年 7 月 26 日，第 7 段

<sup>23</sup> CCPR/CO/72/PRK (2001) 文件

情報”（第 111 條），都是死罪。

## 2.3 死罪的數量

儘管大多數此領域的中國法律學家聲稱，根據 1997 年修改的刑法，中國死罪的數量在 47 個條款中規定了 68 種，但不同的觀察家得出的結論卻並不相同。<sup>24</sup> 而且，自 1997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和立法機關的解釋擴大了某些條款的適用範圍，把死刑運用到更廣泛的情況中去，因此，可能被處以極刑的人數也增加了。

舉例而言，刑法經過隨後 2001 年 12 月的修改，對資助或進行“恐怖主義犯罪活動”，加入“恐怖主義組織”等定義模糊的罪行可以處以死刑，甚至在除加入某組織之外並未犯有其他罪行的情況下，亦可被判處死刑。<sup>25</sup> 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3 年 5 月頒佈的司法解釋，允許對違反刑法中有關為防止蓄意傳播“傳染性病原體”而實施隔離條令的患有非典的病人處以死刑。<sup>26</sup> 另一份於 2003 年 9 月 8 日頒佈的、從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司法解釋，允許對涉及達到一定數量的、通常用於蓄意投毒的有毒化學物品的非法生產、銷售和儲存行為的人判處死刑。<sup>27</sup>

---

<sup>24</sup> 例如，《死刑——全球觀察》（第三版，牛津，2002，第 86 頁）作者羅傑·胡德指出，中國有“至少 62，可能 68 項犯罪”可處以死刑；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執行委員會 2003 年度報告指出，中國有 65 項死罪([www.cecc.gov](http://www.cecc.gov))；河南省鄭州大學法學院法律學者釗作俊指出，中國有 68 項罪行可判死罪；趙秉志教授也指出有 68 項死罪。

<sup>25</sup> 參閱：《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反恐怖主義立法和鎮壓》，2002 年 3 月。（國際特赦組織 AI Index: ASA 17/010/2002.）

<sup>26</sup> 《中國司法機關頒佈有關懲治與非典相關犯罪的解釋》，新華社，2003 年 5 月 15 日

<sup>27</sup> “投毒者受到嚴厲懲罰”，《中國日報》，2003 年 9 月 8 日。

---

## 10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聯合國大會第 32/61 號決議指出：**……死刑懲罰領域裏最主要的目標是逐步減少可判處死刑的犯罪數量，以期實現徹底廢除死刑……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指出：**“死刑使用範圍的擴大引出諸多是否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相一致的問題”<sup>28</sup>

擴大適用死刑的範圍似乎也與中國自身的長期以來的原則不相符合。中國法學家們早就注意到毛澤東主席曾親自建議要謹慎適用死刑，他曾說：“……我們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它只會使我黨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於孤立。”<sup>29</sup> 趙秉志教授指出，毛主席的評論奠定了中國關於死刑政策發展的基礎，最終形成“少殺，慎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的原則。

中國法律學界表示，1979 年第一次通過刑法時，立法者們的目標是依據以上原則嚴格適用死刑。該刑法列出 15 條共 28 項死罪。然而不久這一目標就遭到破壞，趙教授稱其原因是為打擊“……嚴重氾濫的經濟犯罪和刑事犯罪”而實行的“重刑主義”，以及隨之引起的“嚴打”運動。<sup>30</sup>

### 3. 刑事司法程式中導致人權侵犯的失誤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通過的《關於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第 5 條規定：**“必須經一個有管轄權的法院通過合法程式作出最終判決以後才能判處死刑，這些合法程式應提供一切可能的保障措施，以確保審判的公正，至少要不低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規定的保障，其中包括保障任何嫌疑人或被指控犯有死罪的人有權在各訴訟階段獲得足夠的法律協助。”

本章節記錄了中國在對死罪案件的刑事審判程式中未達到以上要求的情況。

---

<sup>28</sup> 人權委員會根據《盟約》第 40 條對秘魯作初步觀察的第三期報告，聯合國第 CCPR/C/79/Add.67 號文件，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5 段。

<sup>29</sup> 《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sup>30</sup> 《從中國死刑政策看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廢止問題》，趙秉志教授，中文版在 2003 年 7 月 18 日的 [www.icrb.com](http://www.icrb.com)。

### 3.1 拘押期間的酷刑與虐待

“拘留”在中國刑法中是指對嫌疑人展開調查（通常在如警察局等拘留所裏進行調查）的一段時期。拘留不同於“逮捕”，因為後者涉及到正式指控。

對於犯罪嫌疑人而言，被員警收押的過程總是充滿極度暴力。眾所周知，中國員警攜帶有電警棍。<sup>31</sup> 他們以暴力方式拘留嫌疑人，從而使該事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達到對被拘留者進行人格侮辱的鮮明目的，也向旁觀者作了一場力量的展示，諸如此類的報導屢見不鮮。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0（1）條規定：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講尊重其固有人格尊嚴的待遇。

《執法人員行為守則》第 6 條規定：執法人員應全面保障被監禁人員的健康，尤其應在被監禁人員需要的任何時間，立即提供醫療護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處罰。

《禁止酷刑公約》第 12 條規定：某一締約國應確保在有適當理由認為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當局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

《禁止酷刑公約》第 13 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凡聲稱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遭到酷刑的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當局申訴，並由該國主管當局對其案件進行迅速而公正的審查。

《禁止酷刑公約》第 15 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係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8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有許多報導表明，中國常有使用酷刑和虐待的方式逼取嫌疑人、被告和目擊者口供以及其他定罪證據的情況。而本報告中的所有案例中，均自始至終有施行酷刑的現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8 年 10 月 4 日批准加入《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

<sup>31</sup> 參閱：酷刑——中國一種日漸擴大的懲罰：該行動了 國際特赦組織 2001 年 3 月。（AI Index：ASA17/004/2001。）有關酷刑作為全球問題方面的資訊，參閱：國際特赦組織 2001 年 6 月的檔（AI Index：ACT40/002/2001）：停止酷刑買賣；以及國際特赦組織 2003 年 11 月的檔（AI Index：ACT40/008/2003）：經營痛苦的貿易商--保安設備及其在酷刑和虐待時的使用。

---

12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刑罰公約》(CAT)，然而中國尚未加入聯合國大會於2002年12月18日通過的《公約任擇議定書》，該議定書允許國內和國際組織機構對拘留場所作定期的參觀檢查。

儘管中國《刑事訴訟法》和《刑法》規定執法人員有目的的實施酷刑是違法犯罪，但監督各締約國是否遵守CAT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卻認定，該規定不等同於公約要求的明令禁止酷刑。<sup>32</sup> 中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國際特赦組織持續紀錄員警使用酷刑逼供，從而“偵破”刑事案件的事例。在該組織的紀錄中，下到員警的後備保安人員，上至法官，各層次的執法和司法人員都有使用酷刑的現象。同樣，中國各種拘留場所裏都有酷刑發生，甚至連法院內也不例外。酷刑的受害者範圍更是及其廣泛，近年來，國際特赦組織監聽到的報導裏，小至有對一名“計畫外”的新生嬰兒施用酷刑作為對其父母的懲罰，大到有對一位70歲維吾爾族記者施用酷刑，強取涉嫌參與一場主要政治示威活動人員的資訊，最終導致其死亡。<sup>33</sup>

刑事拘留期內的死亡人數居高不下，其直接原因就是保安人員或其他被拘留者在公安人員指示下濫用酷刑。國家新聞署2003年12月報導，2003年1月至10月，由於執法人員濫用權力和怠忽職守，造成460人死亡，117人嚴重受傷。<sup>34</sup> 兩名遼寧省員警在不同案件中對兩人進行刑訊逼供，把其中一人關在鐵籠裏，照射強光燈達兩周左右，導致其釋放後一月內死亡；另一人四肢被鎖在鐵籠內側，導致其一夜後立即死亡。該兩名員警於2003年12月分別處以一年和兩年有期徒刑。<sup>35</sup>

根據多年來的詳細研究，國際特赦組織相信中國的被拘留者在審判體系的某些階段，頻繁遭到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威脅。尤其在收押某人因為懷疑其所犯案件是員警急於“偵破”的大案要案，該嫌疑人遭受酷刑的威脅就會更大。

《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不能完全根據口供宣判一個人有罪。然而國際特赦組織監聽的大多數刑事訴訟中，口供均是起訴主證。在這種情況下，員警通常對嫌疑犯及其同夥刑訊逼供，強取進一步線索，當作“確鑿”證據。

---

<sup>32</sup> 參閱：酷刑——中國一種日漸擴大的懲罰：該行動了，國際特赦組織2001年1月(AI Index: ASA 17/004/2001)。

<sup>33</sup> 出處同上。

<sup>34</sup> “員警濫用權力導致今年中國460人死亡”，法新社2003年12月11日。

<sup>35</sup> “酷刑致死，警官被囚”，《南華早報》2003年12月17日。

龔聖亮案件就是這樣一個突出案例。<sup>36</sup> 龔聖亮是一名基督教牧師，在河北省建立主持了一所未經註冊的教會，他被指控犯有強姦罪、故意傷害罪以及“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於2001年12月29日判處死刑，<sup>37</sup> 其四名共同被告也被判處死刑，另外12名教友亦被判處2年至終身監禁不等，罪名均相似。

**龔聖亮／龔勝亮**

2001年12月29日－判處死刑，上訴  
2002年9月22日－命令重新審理  
2002年10月9日－判處無期徒刑

官方對龔牧師案件加以保密，致使對這場死刑審判訴訟中一些特定方面產生困惑與疑問。《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涉及“個人隱私”的審判應不予公開，而對龔牧師強姦罪名的指控，確實要求在調查審判時保護受害人的“個人隱私”。

然而，三名控告龔牧師犯有強姦罪的婦女作了書面證明，聲稱員警為強迫她們提供遭龔牧師強姦的證據，曾對她們動用酷刑，還聲稱幾名施用酷刑的警官反復說他們有上級的支持，允許在此案中使用各種必要手段，獲取對龔牧師不利的證據，還說上級不會要他們對任何後果負責。這份書面證明被偷傳出了監獄，而且被送出了中國。<sup>38</sup>

張紅絹（音譯）於2001年8月14日被捕時，年僅20歲，她在證明書中描寫員警動用酷刑逼她承認自己曾遭龔牧師強姦的過程：“他們給我戴上手銬腳鐐，用電棍碰觸我的身體，特別是我的胸部，我沒有力量抵抗這種侵犯騷擾，就叫他們“流氓”，他們一生氣就變得更暴力，強行脫去我的襯衫，還扯掉一顆扣子，用電棍碰觸我胸部的每一個部位，我拼命大聲喊，但他們把電棍塞到我嘴裏，不讓我喊……有許多人受到這種酷刑，我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我遭受的比其他人都輕。”<sup>39</sup>

據報導，龔牧師本人不僅在拘留期間，還在囚禁的整個階段遭受酷刑折磨。國際特赦組織獲得的可靠消息說，他至今仍然受到虐待，曾不止一次瀕臨死亡，要求醫護治療卻遭拒絕，而且監獄方面嚴格限制其與家人的接觸。

<sup>36</sup> 注意，在龔聖亮案件的非官方報導中，其名字也寫作龔勝亮；他又名龔大力。

<sup>37</sup> 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緊急行動：死刑／緊急處決的恐慌》國際特赦組織2002年1月4日 (AI Index: 17/001/2002) 以及隨後的更新版本。

<sup>38</sup> 張紅絹（音譯），李同進（音譯）和楊彤妮（音譯）寫的證明英文版可參閱網頁 [www.jubileecampaign.co.uk/world/china6.htm](http://www.jubileecampaign.co.uk/world/china6.htm)。該網頁還提供了該案的詳細背景資料，包括命令鎮壓龔勝亮及其組織的官方檔。

<sup>39</sup> 出處同上



---

## 14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認識到酷刑危害之廣，國家以及地方政府機構近來紛紛頒佈新的法規，約束員警的行為。公安部於2003年9月9日宣佈了一套新的法規，旨在約束員警處理行政案件時的非法活動，據相關報導，規管的活動不僅包括對涉嫌的妓女就地罰款並拒絕開發票，也包括酷刑。<sup>40</sup>

浙江省於2003年9月頒佈法規，對發現在刑事案件中刑訊逼供的員警予以處罰。官方報導稱之為“執行公安部的……法規，處理人民警察逼供導致死亡的問題”，這些法規將根據案件的嚴重程度，對酷刑實施者進行一系列的行政和刑事訴訟。<sup>41</sup>

浙江省的法規儘管如上所述被稱為全國性法規，卻並沒有明文規定法庭不得使用嚴刑拷打所得的供詞或其他證據。中國法律這一重大缺陷，也是嚴重影響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一大阻礙。

被告不得不宣佈供詞為逼供所得，或向高一級部門反映自己遭受酷刑的第一個機會往往是他們第一次出庭的時候。酷刑的受害者或是不知道提出正式控訴的程式，或者安全部門以及其他參與施用酷刑的人員對提交的控訴不予理睬，或者根本就沒有指控酷刑的程式。1994年被指控謀殺兩名計程車司機的四名被告之一陳國清說，他曾打算向一位復查該案的檢察官反映其遭受酷刑的情況，但當該檢察官抵達時，拷打他的員警也在場，他因此不敢提及。

1996年，在對陳國清案進行一審時，他與其他三名被告在法庭上露出各自的傷疤，說這些傷口是員警逼供時留下的。但據報導，法官對他們的控訴不予理睬，僅僅說：“……四名被告供認在卷，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足以定罪。”<sup>42</sup> 四人均被處以死刑。

### 3.2 使用戒具是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33條指出：**戒具如手鐐、鐵鏈、腳鐐、拘束衣等，永遠不得作為懲罰用具。此外，鐵鏈和腳鐐亦不得用作戒具。除非在下列情況

---

<sup>40</sup> “中國頒佈新制度約束員警非法行為”，新華社2003年9月9日 (BBC Mon AS1 AsPol ron.)。該報導並未解釋法規延遲至2004年1月1日頒佈的原因。

<sup>41</sup> “浙江禁止員警嚴刑逼供”，新華社2003年9月23日 (BBC Mon AS1 AsPol dh.)。

<sup>42</sup> “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載於《南方週末》，請參閱（中文）網站：[www.fayuan.gov.cn](http://www.fayuan.gov.cn)

日期為2003年7月31日。

下，不得使用其他戒具：

- a) 移送囚犯時防其逃亡，但囚犯在司法或行政當局出庭時，應予除去；
- b) 根據醫官指示有醫藥上的理由；
- c) 如果其他管制辦法無效，經主任下達命令，以避免囚犯傷害自己、傷及他人、或損壞財產；遇此情況，主任應立即諮詢醫官並報告上級行政官員。<sup>43</sup>

與國際標準相反，中國法律卻允許從正式逮捕之時起就對死刑犯使用手銬、腳鐐類的刑具，直到執行死刑時為止。<sup>44</sup>時間通常為一年左右，不過其期限也可能是不確定的。的確，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中，時常能夠看到成群的被拘留人員在正式逮捕之前就帶著手銬和腳鐐的圖像。

據可靠消息，龔聖亮牧師從他最初被拘留，至整個上訴過程，直到他正式入獄的 411 天當中始終戴著腳鐐。僅僅戴了幾天腳鐐之後他的雙腳就麻木了，但是投訴和就醫要求均未被理睬。目前，他的雙腳幾乎失去知覺，行走極度困難。

佩戴鐐銬不僅本身就是極其殘忍和不人道的行為，而且還提供了實施虐待酷刑行為的工具。大量檔記錄了中國酷刑的細節，其中包括用手銬反鎖在押人員，並將他們吊在門上或天花板上，或使用鎖鏈和繩索捆綁來限制其活動。當在押人員處於被動、無抵抗能力時，看守人員會用警棍、電棍和其他武器襲擊他們。<sup>45</sup>

<sup>43</sup>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於 1955 年由第一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和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正式通過。該標準規定了在對待“普遍同意的囚犯待遇的優良原則和慣例”。1971 年聯合國大會號召各成員國執行這些規則，並將其規定在本國的法律中。

<sup>44</sup> 據 1985 年的一份報告，1982 年頒佈的關於監獄和勞改農場看守人員制度規定：“對於被判決死刑，以及等待執行死刑期間的罪犯，可以同時使用兩種刑具（手銬和腳鐐）。除了對定罪案犯以外，使用手銬和腳鐐的時間最多不得超過 15 天。”《法制日報》1985 年 2 月 15 日。

<sup>45</sup> 酷刑——中國一種日漸擴大的懲罰：該行動了，國際特赦組織，（AI Index：ASA17/004/2001，2001 年 1 月）。



### 3.3 超期拘押與單獨監禁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3)條指出：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並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或被釋放。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3)條指出：在判定對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

(c)受審時間不被無故拖延；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原則 19 指出：除須遵守法律或合法條例具體規定的合理條件和限制外，被拘留人或監禁人應有權接受特別是其家屬的探訪，並與家屬通信，同時應獲得充分機會同外界聯絡。

《刑事訴訟法》中已列出視罪行輕重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拘留的明確時間限制。例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69 條規定，對包括死刑案在內的重案犯罪嫌疑人的監禁期為 30 天，正式逮捕必須在之後七天內實施。在“複雜案件”中，警方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請延長正式逮捕和審判前的拘留期。然而，據國際特赦組織經驗，拘留期的武斷延長通常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時間。

在中國，由於拘留的各個階段虐待行為都有可能發生並確實存在，當拘留期被延長時，被拘留人員遭受虐待的危險性更高。這種情況在被拘押人員受到與世隔絕的監禁，無法取得法律援助和家人探訪時尤為明顯。

在中國盛行的這種無理延長拘留期的情況在 2003 年 8 月發表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上的一篇通知裏，就有所顯示。該通知要求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前，解決所有“三年及以上”的超期羈押案件，所有其他案件必須在“年底前”解決。<sup>46</sup>

在 2003 年 11 月 14 日的另一份報告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向各級官員發出警告，如發現官員對無限期拘留負有責任時，他們可能被判處最高至七年的徒刑。<sup>47</sup>

在 2003 年 1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說，在 2003 年的前 10 個月，有 39 個法庭的官員因非法延長嫌疑人的拘留期而受到“[……]行政紀律處罰”。通知還說，將

---

<sup>46</sup> “公安部發出通知：年內清理完畢所有超期羈押案件”。新華社，見 2003 年 8 月 14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www.spp.gov.cn](http://www.spp.gov.cn)。

<sup>47</sup> “中國就羈押期長達幾十年問題警告官員”，法新社 2003 年 11 月 14 日。

近 2000 人的案件被糾正，但自 2003 年 8 月起，有 2906 人受到非法拘留<sup>48</sup>——這就是說，新的案件要多於得到糾正的案件。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還是於 2004 年 1 月 5 日宣佈，中國所有超期羈押的案件都已解決完畢。<sup>49</sup>

2003 年 11 月 14 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主要是回應一件令人震驚的超期羈押案的。謝洪武於 1974 年 6 月 24 日被拘留，直到 28 年後的 2002 年 9 月 30 日才獲釋，他時年 62 歲。據報導，他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期間被拘留的，當時被指控偷運和窩藏“反動傳單”，由於他的地主身份，這一指控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顯得尤為嚴重。

報導中謝的案件直到 1996 年 5 月才被公開，當時由於省級官員在廣西省內視察並為地方官員解釋新頒佈的《刑事訴訟法》，才發現他被拘留於廣西省玉林市某警署一間無窗的牢房中。省級官員在察看警署對他的立案卷宗時發現，其中唯一的文件就是 1974 年 6 月 24 日的拘留證明，之後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訴訟程式。報導說，謝目前患有老年癡呆症，並伴有多種由於監禁直接導致的身體疾病。

儘管報導解釋說，謝的家人以為他在 1974 年被拘留不久即被處死，因此根本不知道他還活著，但是，羈押謝的警署的官員仍然未能提供謝案從未得到審查的原因。此外，亦無人解釋他為何在 2002 年 9 月才被釋放，此時距省級官員發現他的案件後已過去整整 8 年。報告指出，廣西省法律援助中心已經代表謝起訴政府，要求賠償人民幣 596,000 元（69,000 美元），不過就哪個司法部門應受譴責的問題還在爭論中。<sup>50</sup>

<sup>48</sup> “中國的司法工作人員因延長拘留時間而受罰”，新華社，2003 年 12 月 1 日。(BBC Mon AS1 AsPol dh.)

<sup>49</sup> “司法系統清理非法拘留案件”，新華網站，2004 年 1 月 5 日。

<sup>50</sup> “廣西驚天冤案：無罪如監 28 年釋放之後成癡呆”，《工人日報》2003 年 5 月 28 日（中文）。

### 3.4 法律代表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3)條指出：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證：... ..

(b) 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他的辯護並與他自己選擇的律師聯絡。

《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原則 1 指出：人人都有權在整個刑事程式中要求在自己選擇的律師的協助下，保護並建立自身權益和進行辯護。

《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原則 8 指出：“被逮捕、拘留或監禁的任何人均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在毫無遲延、不被竊聽、不經審查和完全保密的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繫協商。執法人員可以在看得見但聽不見的範圍內監督其與律師的交談。”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原則 17 (1) 指出：被拘留人應有權獲得法律顧問的協助。主管當局應在其被捕後及時告知其該項權利，並向其提供行使該權利的適當便利。<sup>51</sup>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96 條，犯罪嫌疑人“可以” “[……]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 聘請律師。這種“可以” 聘請律師的規定表明，獲得律師代理的要求很可能被“合理地” 拒絕。當然，已有大量的報告證明這一權利在執法中被剝奪或削弱。在審訊期間，嫌疑人在這段最易受到酷刑和其他非法強制待遇的時間中，卻無法保密地求助於律師，也沒有律師到場。為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之時起立即提供法律援助，能夠極大地減少員警實施酷刑的機會。

《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保證了因犯罪指控可能被判死刑的人得到律師代理和諮詢的權利。然而，免費律師服務僅僅在開庭“至遲十日以前” 提供（第 151 條），而此時嫌疑人可能已經被拘留了相當一段時間。到那時，員警可能已經搜集了大量合法或非法的證據來指控嫌疑人，卻只給律師大約 10 天的時間核查證據和準備辯護。

國際特赦組織無法確定是否所有可能面臨死刑判決的人都如《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要求的那樣擁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始於 1996 年，且嚴重資金不足的問題眾所周知。有報導說，2002 年，在審核申請人經濟狀況的基礎上，有 600,000 人申請法律援助，但僅有 120,000 人，即 20% 的申請人獲得援助。<sup>52</sup>

<sup>51</sup>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於 1988 年在聯合國獲得一致通過，其中包含一系列國際承認的權威標準，在對待被拘留人員和犯人方面適用於各個國家。

<sup>52</sup> “新規則使法律援助規範化”，《南華早報》2003 年 8 月 1 日。

有報告稱，中國的律師不願接手受檢察機關委託的刑事案件。中國《法制日報》專欄作家查慶九對此給出了兩個原因（除去辯護律師薪酬微薄、收無定時的原因外），第一個原因是，包括中級法院在內的“一些法院”在案件開庭時已對案件“研究”妥當，律師的辯護被看作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大多數律師對刑事案的工作不感興趣。查所指出的第二個原因是，自 1997 年《刑法》頒佈以來，“超過一百名”律師因禁止“虛假證明”的第 306 條受到刑事追訴。

查在文章中暗示了這個“罪行”的本質：“試想一下，有兩個相互對抗的對手，其中一方手握剝奪另一方自由的權力，這種對抗[……]會讓人感到恐懼。”查稱，律師們因此而不願“冒風險”接手刑事案。<sup>53</sup>

2003 年 12 月 9 日，聲名顯赫的辯護律師張建中因被控在他為某銀行前行長貪污案辯護時偽造證據，違反《刑法》第 307 條而被捕入獄。<sup>54</sup>（2002 年 12 月該行長在審判中被判處死刑。）張原本被控違反第 306 條，後來又依據 307 條被判刑，該條對偽造證據的禁止更為寬泛。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張曾經為幾個知名的前領導人和持不同政見者辯護，因此有懷疑說對他的審判含有政治動機。第 306 和 307 條均未對構成“偽造證據”罪給出客觀的定義。但觀察家指出，那些在法庭上為其委託人提供的證據有別於警方證據的律師已經因為它們，尤其是第 306 條的規定而被定罪。<sup>55</sup>

實際工作中，律師經常受到阻撓無法正常協助他們的委託人。報告表明，員警、檢察機關和法院往往認為律師參與案件不利於他們正確判案。這種阻撓可能出現的形式有：警方縮短律師與嫌疑人的會晤時間，短至五到十分鐘；將會見的次數減少到審判前的一次；要求律師向警方提供準備向委託人提問的綱要，並在會見時的談話偏離了被批准的綱要內容時被警方終止會見；極度限制律師獲取訴訟的書證和物證的渠道；或在提供檔副本時索取過高費用。<sup>56</sup>

有證據表明，訴訟程式中正式逮捕前為人們提供的免費法律援助質量不高。四川省一位法官在評價為死刑案被告提供法律援助、作出辯護的律師時說：“責任心不強是普遍的問題。有些律師根本不閱卷或者閱卷很少，致使開庭時，律師準備不充分、遲到，在法庭上坐一坐而已。[……]甚至有些律師在法庭上打瞌睡。”<sup>57</sup>

<sup>53</sup> “談刑辯而色變 –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之憂”，《法制日報》2003 年 1 月 13 日（中文）。

<sup>54</sup> “中國拘留高級辯護律師”，路透社 2003 年 12 月 9 日。

<sup>55</sup> 參閱：《世界人權觀察報告 2003》，人權觀察網站：[www.hrw.org](http://www.hrw.org)。關於在中國辯護律師的整體情況下對張建中案例的詳細分析參閱：《辯護律師成被告：張建中和中國刑事訴訟辯護律師》，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網站：[www.cecc.gov](http://www.cecc.gov)。

<sup>56</sup> 見“空頭承諾：人權保護和中國刑法的實施”，人權中國，2001 年 3 月，[www.hrichina.org](http://www.hrichina.org)。

<sup>57</sup> “兩個死刑犯的最後權利”，《南方週末》，見中文網站：[www.nanfangdaily.com.cn](http://www.nanfangdaily.com.cn)，2003 年

中國法律和國際法律規定的律師代理和其他司法程式在關係到政治“犯罪”（即人們因行使言論和集會自由權而被定罪）或者其他涉及政治敏感的犯罪時，常常被忽略。在這些例子中，中國司法機構常常宣稱案件涉及“國家機密”，這種藉口有效地剝奪了包括律師在內的觀察家瞭解其訴訟程式的途徑。“國家機密”的限制在中國法律中涉及範圍非常廣泛，措辭模糊，而且常常可以被用來掩蓋不公正的審判。

在牽涉到“國家秘密”的案件中，《刑事訴訟法》第 96 條規定嫌疑人要獲取律師代理時“[……]首先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觀察和調研，這樣的申請通常被拒絕。

國際特赦組織瞭解到，在“國家秘密”限定下的眾多案件中，涉案人受到了長時間與世隔絕的拘留，然後被秘密審判。人們常常因為表達了對中國政府，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批評而受到拘留，他們可能被判處長時間監禁，罪名是“顛覆”國家或者“社會主義體制”。<sup>58</sup>

羅讓鄧珠和佛學導師、傳經人阿按紮西的案件即涉及到判處死刑和“國家秘密”。<sup>59</sup>雖然中國政府試圖秘密進行對他們二人的審判，觀察家們卻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對有關這個案件的資訊作了大量研究和發佈。<sup>60</sup>

#### 羅讓鄧珠和阿按紮西

2002 年 4 月 3 日——羅讓鄧珠因涉嫌製造一起爆炸事件遭到拘留

2002 年 4 月 7 日——阿按紮西因涉嫌同謀遭到拘留

2002 年 12 月 2 日——羅讓鄧珠被判處死刑；阿按紮西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2003 年 1 月 26 日——阿按紮西上訴被駁回，羅讓鄧珠被執行死刑

羅讓鄧珠是四川省西部傳統的藏族聚居地的藏民，據官方媒體報導，2002 年 4 月 3 日，他被指控在城市的中心廣場引爆了一枚炸彈後“僅僅 10 分鐘內”被拘留。<sup>61</sup>其他官方報導則稱，他在爆炸發生 10 小時後被捕，而有證人表示，他在爆炸發生兩天後才

11 月 3 日。

<sup>58</sup> 參閱：《中國：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加強監控》，國際特赦組織，2004 年 1 月。（AI Index：17/005/2004）。

<sup>59</sup> 阿按紮西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原名的漢語翻譯，其教名是丹增德勒，教會頭銜是仁波切。

<sup>60</sup> 參閱：《羅讓鄧珠的死刑執行和起訴阿安紮西案——法律、法庭和合法性的辯論》，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2003 年 2 月，網址：[www.cecc.gov](http://www.cecc.gov)。《對一位藏族僧人的審判：阿安紮西案》，人權觀察，[www.hrw.org](http://www.hrw.org)，2004 年 2 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伸張的正義？阿安紮西的審判和相關拘捕》，國際特赦組織 2003 年 10 月（AI Index：17/029/2003）。

<sup>61</sup> “四川省成都市中心的爆炸案”，《人民日報》，2002 年 4 月 3 日。



被拘留。他最終還被指控自 2001 年 1 月起在四川省西部的其他幾個地區“製造爆炸事件”。然而在這一點上，官方媒體在報導他涉嫌引爆的炸彈數量、爆炸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時又自相矛盾。<sup>62</sup>

阿按紮西因涉嫌策劃和資助 2002 年 4 月 3 日的成都爆炸案，於 2002 年 4 月 7 日在四川省理塘縣他修行的寺廟中被拘留。他同時還被指控策劃和資助羅讓鄧珠涉嫌製造的其他幾起爆炸案<sup>63</sup>；兩人都被懷疑並指控製造和散發鼓吹西藏獨立、“搞分裂”的信件和傳單，報導說這些證據是在爆炸現場被發現的；羅讓鄧珠還被指控非法製造武器和彈藥。在阿按紮西被拘留後，許多與他有關聯的人員都被拘留、逮捕並判刑入獄或勞改。<sup>64</sup>

官方對此案的報導稱兩人均已認罪。<sup>65</sup> 在最終審判前的八個月中，兩人大部分時間都處於與世隔絕的拘留之中。據稱正是在這期間，羅讓鄧珠在酷刑下認罪。沒有消息表明律師是否能見到兩人。官方報導說檢察機關為兩人指定了律師，但參與法庭開庭判刑的兩人的家屬否認在審判時看到律師到庭。並且，據瞭解阿按紮西自己選擇律師的要求被拒絕，其原因可能是《刑事訴訟法》的條款中規定，在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中獲取律師協助要“獲得批准”。

### 3.5 正式逮捕和審判準備

正式逮捕的程式需要員警機關在初步調查和其他初步證據的基礎上，向檢察機關提出正式就某罪名起訴某人的申請。逮捕後的拘留期是供員警機關對案件進行進一步調查、搜集證據，以便向檢察機關呈遞案件獲得批准，然後案件可以轉移到法庭進行審理。

正如前文所述有關虐待的內容（參閱 13-18 頁），員警機關獲取和鑒定被告違法“證據”的方式常常遠不符合中國法律和國際標準。就算檢察機關原本應對卷宗進行核查，法庭審理時經常出現有嚴重漏洞和偽造痕跡的證據。

在一個被中國官方媒體廣泛報導的案件中，有四個人因涉嫌在河北省承德市謀殺兩名計程車司機，於 1994 年被拘留並逮捕。此案的官方報導稱承德這樣的“旅遊城市”中此類案件頻發，因此員警機關十分急於破案。經過兩個月毫無進展的偵查後，員警機關最終在承德市郊拘留了陳國清。導致他成為懷疑對象的線索是他“情緒反

<sup>62</sup> 《對一位藏族僧人的審判：阿安紮西案》，人權觀察，[www.hrw.org](http://www.hrw.org)，2004 年 2 月，17-18。

<sup>63</sup> “甘孜”是中文對更常用的藏語“Kardze”的音譯。

<sup>64</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伸張的正義？阿安紮西的審判和相關拘捕》，國際特赦組織 2003 年 10 月（AI Index：17/029/2003）。

<sup>65</sup> 《成都天府廣場實施爆炸的兩名藏人被嚴懲》，見中文網站：[www.tfol.com](http://www.tfol.com) 2003 年 1 月 26 日。

---

22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常，鬱悶不樂。”其他三人，楊士亮、何國強和朱彥強亦於此後的一段時期被拘留。據報導，在酷刑下四人都認了罪，負責偵察的警官受到了嘉獎。

四個人在 1996 年初的一審中都被判處死刑。然而，在 1996 年 10 月的二審中，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命令重審此案，並對二十多條警方搜集的指控證據提出質疑。

例如，有一條主要的證據是，在陳國清的家中發現的據稱是殺人兇器的一把極為常見的刀上的血型與被害人之一的血型吻合。然而，法庭上根本沒有提供化驗的證據，而法庭上所依據的化驗時間甚至早於警務人員獲取此刀的時間。

同樣地，所謂對被告進行過的唾液檢驗結果也沒有在庭審時出示，而且日期竟在被告人被拘留之前。以此為據，檢察官稱被告的唾液類型與犯罪現場發現的煙頭上的類型相吻合。當辯護律師質疑該證據並要求重新化驗時，檢察官稱煙蒂在化驗中已完全毀壞，重新化驗是不可能的。唾液化驗的“證據”在以後每次庭審中都被提出當作他們與犯罪現場有關的最主要證據。

在犯罪現場沒有發現四人中任何一個的指紋，而可能關聯到其他人的證據卻沒有受到偵查機關的跟蹤調查。並且，法庭拒絕接受四人的不在場證據，陳國清一案的不在場證據包括他案發時在工廠上班的登記記錄，以及同事證明他們見到他在工作的證詞。<sup>66</sup>

該案的更多細節將被用在第 5.2 部分——“根據上訴命令復審判決或復審”，作為未能依循審判和上訴程式的例證。

---

<sup>66</sup> 關於中國媒體對此案更詳細報導和評論參閱“六年未結死刑案暴露刑訴大問題”《法制日報》中文網站：[www.legaldaily.com.cn](http://www.legaldaily.com.cn) 2001 年 2 月 5 日；“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南方週末》，中文網站：[www.fayuan.gov.cn](http://www.fayuan.gov.cn) 2003 年 7 月 31 日；“河北承德：陳國清等人‘搶劫殺人’案”，郭國松，中文網站：[www.shuku.net](http://www.shuku.net)，未署日期；和《被反復駁回的死刑判決》，中文網站：[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 2000 年 12 月 27 日。

**陳國清、楊士亮、何國強和朱彥強**

1994 年 11 月 3 日至 1996 年 2 月 24 日 — 四人因謀殺嫌疑被拘留

1996 年 — 四人均被判處死刑，上訴

1997 年 8 月 12 日 — 四人均判處死刑，上訴

1998 年 10 月 13 日 — 四人均被判處死刑，上訴

2000 年 10 月 20 日 — 陳和楊被判處死刑；何判處死刑緩期兩年；

朱判處無期徒刑，上訴

2003 年 7 月 21 日 — 由河北省高級法院審理，等待終審判決

來自陝西農村的婦女趙粉絨的案件也有相似之處，用來判處她死刑的證據有偽造痕跡且不完整。

趙被指控於 1998 年 12 月謀殺同村的兩名兒童。在兩名兒童食用了塗有滅鼠藥的糖果死亡兩天後，趙於 1998 年 12 月 13 日在企圖自殺後成為本案主要的嫌疑。據報導她此前也有幾次因婚姻問題而企圖自殺，但這次自殺企圖的時間巧合使她立即成為嫌疑人。報導說她在受到酷刑後承認毒殺了兩名兒童。

警方宣稱她殺人的動機是報復死亡兒童的父母，因為他們不小心破壞了她家的供水管道。但趙是在被拘留後才發覺管道破裂的；警方對“犯罪現場”——即趙的家中，據稱她在那裏製作了有毒的糖果——作出的報告的日期是趙成為犯罪嫌疑人的兩天前；警方對趙 9 歲的女兒錄了證詞，來驗證她母親的“反常情緒”（該證詞被用作在法庭上指控趙的證據），但談話是在沒有成年親屬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是違反法律規定的；驗屍時在孩子們的胃裏發現了有毒物質，但是沒有對糖紙或孩子們消化掉的其他食物進行化驗。儘管這些不完整而且有明顯偽造痕跡的物證帶來很多疑點，但趙粉絨還是在 1999 年 6 月被判處死刑。<sup>67</sup>

<sup>67</sup> 見“農村婦女三次被判死刑 陝西又見“槍下留人”案”，《北京青年報》中文網站：[www.southcn.com](http://www.southcn.com)，2003 年 5 月 11 日；“3 次被判死刑兩次重審 陝西農婦被槍下留人”，《華商報》中文網站：[www.huash.com](http://www.huash.com) 2003 年 11 月 7 日。注意，儘管趙粉絨的案件在中國媒體得到廣泛報導，但這些報導的絕大多數都是本文引用的詳細報導的編輯版。



**趙粉絨**

1998 年 12 月 - 因涉嫌毒殺兩名兒童被拘留  
1999 年 6 月 2 日 - 判處死刑，上訴並獲得復審  
27 March 2000 - 判處死刑，上訴並獲得復審  
2001 年 4 月 27 日 - 判處死刑，上訴  
2002 年 12 月 - 判處死刑，緩期兩年  
目前在獄中，已提出復審訴請

在上文引用的龔牧師的案例（15 頁）中，關於警方搜集的控證幾乎是不得而知。不過，大家都知道，龔牧師的教會並未在政府註冊，而且在他被拘留之前，他教會的集資活動引發了政府對教會其他活動的調查。例如，有證據說龔牧師和他的追隨者們涉嫌“強迫”民眾以每本三元（0.36 美元）的價格購買教會出版物，並且“逼迫和誘導”民眾向教會控制的帳戶中存款。警方稱還有證據證明龔牧師曾對他懷疑向警方舉報他的人進行毆打和用硫酸襲擊；且正如前文所述，警方還有“證據”指證他強姦了他教會內的 10 名婦女，這些證據都是酷刑逼供所得。<sup>68</sup>

因為龔牧師的審判已經結束，外界觀察家已不可能驗證那些指證他和他的同案被告並據以判處他們死刑的證據是否可靠。國際特赦組織很關注此案，這是因為聽到指控龔牧師強姦罪的證據是來自酷刑的報告以後，使人們對指控他和同案被告的證據的可信性提出質疑。

據報導，龔牧師拒絕在政府註冊他的教會是出於他的宗教信條，觀察家將其描述為“傳統”，<sup>69</sup>但是在卷宗中對他指控的證據中則將此描述為“異端”，其根本是“對《聖經》的錯誤解釋”。一份洩漏的調查他教會活動的內部檔指出，他曾經把中國政府叫做“魔鬼”，把中國共產黨叫做“撒旦的王國”。<sup>70</sup>

這樣的言論在全國範圍內打擊“邪教組織”的時候很有可能激起地方政府的敵意。這次打擊活動主要針對的是 1999 年由法輪功練習者進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官方認可他們的練功為一個宗教派別的舉動，這一行為被政府理解為對它的權威的直接挑戰。<sup>71</sup>評論家注意到，當權者頒佈的、用來起訴法輪功和像龔牧師教會的“反迷信”立

<sup>68</sup> 關於政府官員對龔聖亮本人，其教會和教友採取的措施的深入報導，見：[www.jubileecampaign.co.uk/world/china6.htm](http://www.jubileecampaign.co.uk/world/china6.htm)。

<sup>69</sup> 與天主教大赦年活動領導人丹尼·史密斯（Danny Smith）的書信往來。

<sup>70</sup> 參閱註腳 68。

<sup>71</sup> 法輪功運動的練習者和支持者仍經受著中國對於“邪教組織”的嚴厲打擊。在該運動中，有聲稱說，到 2004 年 3 月，因堅持練習法輪功被拘留的人中有 900 多人喪生於拘留所；還有內部

法，已經嚴重破壞了致力於在中國法律的原則下，以維護人權為目標的法制改革。<sup>72</sup>

#### 4.一審

在中國，死刑案的初審通常都由中級法院來進行。上訴則由省級高級人民法院，即二審法院審理。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 14(1)條指出：** [...]在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

**《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第 1 條指出：** 司法的獨立性應得到國家的保障，在國家憲法或其他國內法律中加以規定。任何政府及其他機構都有責任尊重、維護司法的獨立性。

在中國，司法獨立的必要性已經爭論多年。基於法院的經濟來源和司法人員的工資都由地方政府負擔，法官經黨委任命，且很多法官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員的事實，評論家看到了潛在的濫用司法權的危機。政治局委員、主管安全和法律事務的高級官員羅幹在 2003 年 12 月 17 日的各級法院領導會議上說，“[……]必須有效加強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領導”。<sup>73</sup>

而且，中國的各級法院都受到政法委員會的監督。政法委員會是專門機構，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且對其進行監督。<sup>74</sup> 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法院的另一條途徑是通過黨組領導，黨組由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組成。這樣的委員會存在於中國所有的政府職能部門，他們負責在國家機關中實施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因此，刑罰的形式很容易受到地方和中央黨組織意見的左右，這就嚴重影響了被告在共產黨和政府行為下獲得公正審判的可能性，例如在“嚴打”運動中，就是如此。

洩漏的檔中稱死亡人數為 1600 左右，死因是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肉體折磨，例如強制進食。見該運動的新聞網站：[www.clearwisdom.net](http://www.clearwisdom.net)

<sup>72</sup> 參閱：《法輪功問題：中國政治和維護法制的鬥爭》，羅奈爾得 C. 克斯和林知秋（Ronald C. Keith and Lin Zhiqiu），《中國季刊》2003 年 9 月，第 175 期，623-642 頁。

<sup>73</sup> “中國政治局委員在法院院長會議上講話”，新華社 2003 年 12 月 17 日。（英國廣播網 BBC Mon AS1 AsPol qz.）

<sup>74</sup> 關於各級法院和人大關係的討論和分析，參閱：“唇齒相依還是多餘的法官？中國地方人大對法院的監督”（研究報告）趙英男（Young Nam Cho），《中國季刊》第 176 期，2003 年 12 月。pp. 1068-1083

在“嚴打”運動期間，全國範圍內絕大多數普通犯罪案件的審理中，法院都面臨巨大壓力而對被告人從重判處。河南省鄭州大學法律系的法律專家釗作俊稱，為迎合“嚴打”，某法院用死刑代替了正常的判決。

該法院 “[……]在二審時被改判、發還重審率高達 43%。他們透露， [……]正是由於擔心[共產黨] 地委一些領導同志會說其打擊不力。他們認為，反正有二審把關呢，一審中多宣告幾個死刑也無關緊要，將來二審改判了，還不會被他人指責說打擊不力”。<sup>75</sup>

案件的初審在中級法院進行，由三位法官組成的審判團審理，判決的方式是根據庭上證據和證詞，以壓倒多數意見為準。然而，情況通常是在被告出現在法官面前之前判決已獲批准。中國的每個法院都有審判委員會，這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49 條成立的，其職能是裁決 “[……]疑難、複雜和重大案件”，其中包括 “[……]可能會判處死刑的案件。”<sup>76</sup> 審判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官員組成，其中包括至少一名法官，此人獨自審查卷宗，甚至不會實際參與庭審或與被告及其律師見面。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定對審判團具有約束力。

因此，很有可能在要案中的被告站在審判庭上時，法院已對其做出裁決甚至是判決。這可能就是為何有些審判持續的時間會如此之短的合理原因：在持續不到一小時的初審後就對人做出死刑判決是司空見慣的；<sup>77</sup>（這裏應該重申的是，1998 至 2002 年間，有 99.1%的初審案件均以判決有罪終結。<sup>78</sup>）

從職業法官應具備的教育程度、相關經驗和所受培訓的角度對審判團和審判委員會中任職法官的專業性的考察在中國法律界已成為曠日持久的辯論話題。2001 年 3 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討論會上，一位代表當面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提出：“每年，司法和檢察機關官員的素質低下問題都被列在持續出現的問題中，[……]這個問題年年重複提出，但我們並未看到任何改變。這必然意味著體制有問題。”<sup>79</sup> 這位代表還指出，只有 20%的中國法官受過高等教育。<sup>80</sup>2003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發

<sup>75</sup> 《死刑的司法現狀及其展望》，釗作俊，中文網站：[www.law-lib.com](http://www.law-lib.com) 2002 年 6 月 27 日。

<sup>76</sup>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114 條。1998 年 6 月 28 日。

<sup>77</sup> 關於中國刑事司法系統中審判委員會職責的討論，參閱：“建議取消審判委員會”，陳傑人，《法律與生活》，2003 年 7 月第二期。中文網站：[www.sohu.com](http://www.sohu.com)

<sup>78</sup> 見第三頁，註腳 8。

<sup>79</sup> “中國高級法官就人權和法律標準受到責問”，2001 年 3 月 12 日，法新社。

<sup>80</sup> 根據 199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 9（6）條，高等院校法律專業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後可任法官；具有法律專業學士學位，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可任法官；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者畢業後即可成為法官。最低年齡限制是 23 歲。

佈一項通知，爲了提高 “[……]法官的效率和素質，不再允許普通職員以逐步升級的方式就任法官。”<sup>81</sup>

中國法律專家建議，只有受過專業培訓的法官才能被允許審理死刑案，<sup>82</sup> 此言暗示，死刑判決可能由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法官做出。

#### 4.1 政治干預

羅讓鄧珠、阿安紮西和龔牧師及同案人的案件都成爲政府爲了達到公開的政治目的而直接干涉司法程式的例子，

多年來，阿安紮西作爲宗教導師和受人尊敬的社區領袖的聲望使他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區的當局眼中成了“眼中釘”。因害怕被強制拘留，他先後於 1998 和 2000 年逃離該地區，後又因當地居民冒著極大危險向當地政府遞交具名請願書而返回。1998 年，他爲了重建一座寺廟而越過地方政府，直接到北京向班禪喇嘛請願，此舉激怒了地方當局。<sup>83</sup> 而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印度學習時，曾被達賴喇嘛認作一位佛學導師的轉世。中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藏民與被北京政府叫做“分裂分子”的達賴喇嘛的任何接觸都抱高度的警惕態度。

在 2002 年 12 月 2 日一次秘密審判後，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羅讓鄧珠死刑，阿安紮西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兩人均被指控“製造爆炸事件”和“煽動分裂國家”罪，羅讓鄧珠還因“非法擁有槍支和炸藥”的指控被判刑。

在判決中，據說羅讓鄧珠曾大叫說他是無辜的，而且他也未在爆炸中牽涉阿安紮西或其他任何人。<sup>84</sup> 阿安紮西在審判入獄後的一次談話記錄中也稱自己是無辜的，這一記錄由自由亞洲廣播台獲取並偷運出中國。“對我的起訴是錯誤的，因爲我一直真誠地致力於藏族人民的利益和安康。中國人不喜歡我的言行。這是我被捕的唯一原因。[……]我一直說，我們甚至不應對別人舉起巴掌，這是有罪的。我既沒有散發信件和傳單，也沒有秘密安放炸彈。我甚至從未想到過這樣的事情，而且我也沒有傷害他人的企圖。[……]秉持公正的人應該對我的案件進行徹底調查。”<sup>85</sup>

<sup>81</sup>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宣佈嚴格遴選法官的條件”，新華社 2003 年 10 月 27 日。(BBC Mon AS1 AsPol sg.)

<sup>82</sup> 參閱《死刑的司法現狀及其展望》，釗作俊，中文網站：[www.law-lib.com](http://www.law-lib.com)，2002 年 6 月 27 日。

<sup>83</sup> 參閱《著名喇嘛因“爆炸案指控”被拘留》，西藏資訊網路，網站：[www.tibetinfo.net](http://www.tibetinfo.net)，2002 年 5 月 5 日和相關跟進報導。

<sup>84</sup> 《對一位藏族僧人的審判：阿安紮西案》，人權觀察，[www.hrw.org](http://www.hrw.org)，2004 年 2 月，20 頁。

<sup>85</sup> 法新社報導，見 [www.rfa.org](http://www.rfa.org) 2003 年 2 月。



外界無從知曉呈上法庭來指控這二人的證據的具體內容。稱此案包含“國家秘密”的說法使得政府能夠阻止所有觀察家獲知審判內容，並宣佈所有證據保密。而這些也沒有在中文版的官方媒體上進行報導。

在不能獲知用來指控這二人證據的情況下，不能對涉嫌存在的酷刑進行完全公開的調查，以及無從得知他們是否能夠依據國際標準指定律師進行辯護的情況下，對此案訴訟程式的合法性的質疑就會持續下去。

類似的懷疑還存在於對龔牧師及同案人案件的拘留、審判和判決中，懷疑個中可能存在政治動機。正如羅讓鄧珠和阿安紮西案由於牽涉“國家秘密”而不公開審理，龔牧師的審判也不公開，原因是指控和證據涉及“個人隱私”，即強姦指控。

然而，根據偷運出中國的龔牧師在獄中寫的信件，在法庭上，檢察官實際上根本沒有提出有關他強姦的指控，但他還是被宣判犯有強姦罪，並因此被判處死刑。“就所牽涉到的法律程式而言，被告人根本無法得知他因強姦罪被起訴，他也不知道所謂被他強姦的人是誰，她的名字叫什麼。”<sup>86</sup>

顯然，對於他犯有強姦罪的指控，法院僅根據用酷刑逼供得到的婦女的證詞就已經對其定罪。他還因“導致故意傷害”而被判有罪，但事實上，根本沒人出庭作證，指證他犯有此罪；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曾攜帶或使用所謂的襲擊武器——硫酸。龔牧師還因“利用邪教組織阻撓法律實施”被判有罪。

如果龔牧師和他的律師在法庭上未能獲得交叉詢問控方證人的機會，這便是違反公正審判國際標準的。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3)(e) 條給予了被告和其律師全面詢問控方證人的權利。“匿名證人”的證詞也剝奪了被訴方核實證人可靠性的必要資訊。

龔牧師仍在監獄中。除了因開始拘留後一直佩戴腳鐐 411 天所導致的持續性傷害之外，他還患有嚴重的胃病，且有呼吸困難——可能是哮喘或者其他由於拘留環境導致的疾病。他仍帶著酷刑導致的傷痛：他一隻耳朵已經失聰，大小便都便血。雖然有確鑿證據說明他“表現良好”，監獄當局仍嚴格控制他家人的探訪，而且他仍不能接受醫療救治。

#### 4.2 無罪推定

<sup>86</sup> “龔牧師寫於死牢的四封信”，蓋裏·梁和鮑勃·付（音譯 Gary Lane and Bob Fu）編輯，2002 年 9 月，14 頁，網頁 [www.persecution.com/newsContent/Gong/pdf/Pastor\\_Gong\\_Letters.pdf](http://www.persecution.com/newsContent/Gong/pdf/Pastor_Gong_Letters.pdf)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2) 條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

新《刑事訴訟法》在 1996 年修訂、頒佈時，一些評論家就該部法律中的一些條款表示關注。儘管這些條款並未明言嫌疑人享有無罪推定的權利，至少從總體上看，無罪推定的原則已隱含在這些條款之中。

比如說，《刑事訴訟法》第 12 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然而第 12 條並未提及有關無罪推定的一些核心問題，如舉證的責任和標準。<sup>87</sup>

《刑事訴訟法》第 162 條第 3 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無罪判決。”然而，第 35 條仍然規定舉證的責任在被告一方：“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行輕微、可減輕處罰或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如我們在前面已提到，員警會採用一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獲取認罪，當案件進展到庭審階段時，任何無罪推定的原則都已經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警官拘留了嫌疑人而“成功破案”，就會獲得種種嘉獎，得到獎金和提升，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庭審之前。中國人民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副任何家弘教授曾寫道：“公安機關抓到犯罪嫌疑人，拿到口供，開了慶功會，整個案子就算破了……被告人究竟有沒有罪，不能由偵查人員說了算，……由法官來認定被告是否有罪。”<sup>88</sup>

在中國，審判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可能破壞無罪推定原則，如被告人——包括情節嚴重的案件中——常戴著手銬和腳鐐出現在法庭上，有時身著囚服，有時被剃了光頭，所有這些都旨在讓他們看上去像囚犯並忍受囚犯的待遇。

王有恩的案件提供了一個違反無罪推定的有力例證。王有恩因被控謀殺前前後後總共被審判了四次，每次都被判處死刑。2000 年 2 月 24 日，當他接受第三次審判時，法官在庭上問他：“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你沒有殺人？”2000 年 11 月 8 日，黑龍江省高級法院最終因證據不足宣告王無罪，而這距他最初被拘留已有六年了。<sup>89</sup>

<sup>87</sup> 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改革和人權》，國際特赦組織 1997 年 3 月發表，第 16 頁。(AI index: ASA 17/049/1997.)

<sup>88</sup> “河北高院開審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奇案”，原載於《南方週末》。參閱網站：[www.china.org.cn](http://www.china.org.cn) 2003 年 7 月 31 日。

<sup>89</sup> “‘死囚’獲賠 14 萬”，原載於《北京青年報》2002 年 4 月 28 日（中文）。

在承德中級人民法院的一次案審中，儘管指控陳國清和三位同案被告的證據明顯不足，並有偽造的證據，但仍將他們判處了死刑。當案的一位法官接受採訪時說：“雖然法律規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可以宣佈無罪，但是，法律和實踐總是有差距的。”<sup>90</sup>

## 5· 上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5) 條規定：**“凡被判定有罪者，應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復審。”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通過的《關於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1996/15) 第 6 條規定：**“……敦促可能實施死刑的成員國，確保與死刑執行有關的所有官員全面瞭解上訴的情況及涉案人要求寬大處理的申請。”

《刑事訴訟法》第 183 條規定，被判以極刑的被告人在收到書面判決的 10 天內可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刑事訴訟法》第 180 條規定：“對被告人的上訴權，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剝奪。”然而，近來中國法院在努力減低上訴率，以減少支出，加速司法程式。法院每年要提交報告，提供有關一年來工作情況的一般性統計數位，其中包括上訴案件的數字。例如，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報告顯示，2002 年所有判決中上訴案件的數字比上一年下降了 23%，2003 年這一數字又下降了 27%。報告還說，2002 年被上訴法院判決重審或推翻原審的數字比 2001 年下降了 69%。<sup>91</sup>該報告沒有具體分解這一數字，所以不清楚有多少上訴是針對死刑判決的。

中國的一些評論家為上訴數字的下降而鼓舞，認為這表明人民相信法院的效率和透明度。也有一些人擔心，過於重視上訴率並以此來評判法院的能力會造成“某些法官”剝奪被告人上訴的權利，以降低所在法院的上訴率。<sup>92</sup>

還有評論家指出，低上訴率可能來自被告人對司法系統的絕望，感到即使上訴也無濟於事。北京市政府就北京市民對政府部門工作滿意程度所作的一項網上調查就

<sup>90</sup> “河北承德：陳國清等人‘搶劫殺人’案”，郭國松著。讀者可查詢中文網站：[www.shuku.net](http://www.shuku.net) 該檔沒有日期記錄。

<sup>91</sup> “聚焦‘東營中院現象’，四大突破探‘黑馬’”。參閱中文網站：[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 2003 年 11 月 19 日。

<sup>92</sup> “審判考評未入誤區”，刊載於《法制日報》2002 年 11 月 5 日（中文）。

反映出了這種態度。在第一次調查中，只有 2% 的回答者表示對北京市的司法部門的工作滿意。<sup>93</sup>

對死刑判決的上訴程式要求，首先，由省級高級法院即二審法院派出三至五名法官組成的工作小組審查案件的檔案。在審核完所有證據和律師的請求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89 條規定，省級法院有三種選擇：1)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 如相信事實的認定確鑿無疑，只是在適用法律或量刑上存在錯誤，則修改判決；3) 認為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則在澄清事實後修改判決，或撤回判決併發回至原法庭重審。一起案件發回重審的次數並沒有限制。國際特赦組織瞭解到的案件表明，上訴法院更傾向於把案件發回重審，而不是自己承擔起修改判決的工作。

### 5.1 上訴中修改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189 條第 2 款規定：“如果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相當於省級法院）在 2003 年 8 月 8 日的報告中說，在 2001 年 4 月至 2003 年 3 月為期兩年的全國性“嚴打”中，該法院將 35 起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立即執行判決，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該報告聲稱，其原因要麼是考慮到了從輕的情況，要麼是在對定罪有任何疑點時不核准判決。<sup>94</sup>然而，值得懷疑的是，在中國到底有多少家高級人民法院願意、或者有能力嚴格監督案件審判並修改判決。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90 條規定，如果上訴請求是由被告人提出，上訴法院不得加重處罰；但如果公訴人以處罰太輕為由提出抗訴，判決可以加重，直至處以極刑。例如，2002 年 9 月 12 日四川省資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因大量製造迷幻藥物判處華豔無期徒刑。資陽市人民檢察院抗訴至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四川省高院於 2003 年 4 月 17 日批准了死刑判決。<sup>95</sup>

### 5.2 上訴法院下令修改判決或案件重審

《刑事訴訟法》第 189 條第 3 款規定：“如果原判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法

<sup>93</sup> “民意調查：絕大多數北京市民不滿政府工作”，法新社 2003 年 11 月 21 日。

<sup>94</sup> “北京法院嚴把死刑關，35 名死刑犯被‘槍下留人’”，原載於《北京晚報》。讀者可查詢中文網站：[www.ben.com.cn](http://www.ben.com.cn) 日期為 2003 年 8 月 8 日。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對於 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12 月期間北京市中級法院判處的死刑、處決及死緩案件的追蹤（不包括援引時間的最後三個月），共有 320 例死刑、255 人被處決、22 例死緩。

<sup>95</sup>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冰毒皇后’判處死刑”，參閱(中文)網站：[www.scol.com.cn](http://www.scol.com.cn)，2003 年 11 月 20 日。



庭)可以在查清事實後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一般情況下，如果中級法院在證據不足或者“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作出了死刑判決，上訴法院通常會要求原先作出判決的法院重新審理案件。然而，案件發回重審並不能保證被告就會得到公正的審判，而且在中國的司法制度下，案件重審的次數並沒有限制。

正如前文所述，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 1996 年 10 月 6 日將陳國清和三名同案被告的案件發回重審。四人均就 1996 年初審對他們作出的死刑判決提出上訴，而省級高級法院把案件發回重審的理由是控方有超過 20 條證據需要澄清。

陳國清和三名同案被告在 1997 年 8 月 12 日接受了重審。儘管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已提出疑點，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仍然以同樣的罪名，基於同樣的“罪證”，判處四人死刑。法庭依舊拒絕調查四人提出的曾受到刑訊逼供的申訴，也拒絕接受四人提出的不在場證明。

一位記者注意到，在 1997 年的判決文書中缺少了“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足以定罪”的字樣。<sup>96</sup>

四人又一次提出上訴，1998 年 2 月 16 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又以“事實不清”的理由要求對案件進行第三次重審。然而，1998 年 11 月 13 日進行的重審又一次以同樣的證據判決四人有罪，並判處四人死刑。<sup>97</sup>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接到四人的上訴請求後，再次要求重審案件。這次重審在 2000 年 11 月 20 日舉行，判處兩人死刑，一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一人無期徒刑。法庭對四人作出判決的基礎仍然是原來的“證據”，法庭拒絕接受任何同控方證據相悖的證據。不僅如此，控方連出示的文書材料都同 1998 年和 2000 年的完全相同。

在對這四人的審判中還存在另一個深刻的弊病：在最後三次審判中，判決都出自同一個法官。這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 192 條，即重審案件應由幾名法官組成的新工作小組審判。任何一位法官都不大可能自願地更改自己原來的判決——第 192 條的規定正是為了防止和避免這一情況的出現。<sup>98</sup>

北京大學著名法學家陳興良對此案做了大量的評述。陳指出，儘管存在調查司

---

<sup>96</sup> “河北承德：陳國清等人‘搶劫殺人’案”，郭國松著。參閱中文網站：[www.shuku.net](http://www.shuku.net) 檔沒有日期記錄。

<sup>97</sup> “河北高院開審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奇案”，原載於《南方週末》。參閱中文網 [www.china.org.cn](http://www.china.org.cn)，2003 年 7 月 31 日。

<sup>98</sup> 同上。

法不公的系統，可如果上訴法院下令進行這樣的調查，“……這樣下級法院很沒面子。”因此，上訴法院更喜歡把案件發回重審，希望下級法院可以自行糾正錯誤，因為案件將由另外的工作小組來審判。<sup>99</sup>報導並沒有說明為什麼同一名法官被允許連續三次出現在工作小組中。

四人的案件在 2003 年 7 月 21 日再次重審，這次是由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審理。顯然，當局對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無法作出適當的判決感到惱火，省高院要有所表示。據報導，在公開聽審過程中，法庭允許四名被告提出不在場證據，也允許展示刑訊逼供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傷疤，並指證對他們施行酷刑的員警。有一則報導宣稱，這是四名被告首次被允許展示傷疤，在之前的審判中他們都戴著手銬。報導說陳國清說話和思維已明顯出現障礙，無法連貫地表達自己。<sup>10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員傅寬芝說：“我認為有些辦案人員的素質也是比較差的。……有些人不僅應該提高業務素質，其職業道德也有問題。”<sup>101</sup>

在本文完成之時，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尚未對案件作出終審判決。

同陳國清等人的案件類似，趙粉絨被控毒殺兩名兒童案也依舊沒有得到解決，案件中同樣存在證據前後矛盾的情況。

趙粉絨在 1999 年 6 月由陝西省商洛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被指定在法庭上代表她的“法律工作者”（並非職業律師）辯解說趙確實在糖果上綁上了毒鼠藥，意圖以此毒殺兩名兒童。但據稱趙在案發前一天晚上把糖果放在臺階上，是被害兒童的父母自己把糖果拿到屋內的，因此對趙的判決應當減輕。

上訴聽證前，趙的丈夫說服兩位律師審查他妻子的案件檔案。正是這兩位律師發現了證據不一之處：員警曾對犯罪現場即趙家作出報告，而報告的簽署日期竟是趙受到懷疑之日的兩天前。警方說趙的動機是報復，因為被害兒童的父母毀壞了她家的供水。但是，趙是在被監禁之後才聽說自家的供水管被那兩名兒童的父母毀壞（除此而外，再沒有人證明兩戶人家間存在任何糾紛，這兩戶人家的鄰里關係本是不錯的）。趙九歲的女兒有一份證詞，證明其母“神色奇怪”。這份證詞是在沒有任何成年親屬在場的情況下取得的，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式。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趙和糖果有關，解剖報告也證明被害兒童體內的毒鼠藥同糖果沒有關係。

<sup>99</sup> “六年未結死刑案暴露刑訴大問題”，原載於《法制日報》。參閱中文網站：[www.legaldaily.com.cn](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1 年 2 月 5 日。

<sup>100</sup> “河北高院開審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奇案”，原載於《南方週末》。參閱中文網站：[www.china.org.cn](http://www.china.org.cn)，2003 年 7 月 31 日。

<sup>101</sup> “超期羈押九年至今仍未審結，法律專家評論辦案過程，原載於 2003 年 8 月 13 日《北京青年報》。參閱中文網：[www.zqslaw.com](http://www.zqslaw.com)，2003 年 11 月 2 日。

---

34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 2000 年 3 月把案件發回商洛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有鑒於案件檔案中證據不一，兩位律師指示趙請求無罪判決。兩位律師相信，他們對酷刑的調查使案情對他們更加有利，他們調查了趙受到刑訊逼供的情況，並在法庭上出示了在趙拘留期間同趙同處一間囚室的人員的證詞，她們都作證看見趙的腿上和背上有淤傷和勒痕。然而，證據的不一致和他人的證詞顯然沒有引起法庭的重視。趙被第二次判處死刑，趙再次上訴。

幾個月以後，兩位律師中的一位碰巧因別的工作去了省高級法院。她順便問了一位法官有關趙上訴案件進展如何，那位法官回答說：“執行令還未簽發呢。”兩位律師立即呈送了一份緊急申請至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據說，暫緩執行的命令直到 2000 年 9 月 20 日才送到趙所在的拘留所，距原定的執行日期僅一夜之隔。

報導並沒有說明為什麼在趙的上訴待審期間會簽發執行令。值得注意的是，兩年以後，又是這家法院——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未通知董偉的辯護律師其辯護人的上訴請求被駁回，死刑執行令已經發出。（見 38 頁）

2001 年 4 月 27 日高級法院將趙案第三次發回重審，再次要求澄清證據中的不符點。然而商洛市中級人民法院又一次將趙判處死刑，判決書中說：“……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足以正國法。”

趙最近一次的上訴請求於 2002 年 12 月才開始在陝西省高級法院聽審。中國的媒體報導均沒有解釋為什麼上訴請求要花整整 20 個月的時間才能開審。儘管有相反的證據，陝西省高等法院仍然認同商洛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事實清楚”，判處趙死刑，不過這次是緩期兩年執行。<sup>102</sup>

趙一直被關押在陝西省女子監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203 條，她的兩位律師在 2003 年 4 月呈送請求至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重審案件。直至現在，我們還沒有聽到任何回應消息。

在龔牧師及其 16 名同案的案件中，據報導湖北省高等法院以“事實不清”，定罪證據不足為由下令案件重審。2002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案件在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重審。由於審理仍然是封閉式的，所以還不清楚省高級法院是對哪些指控龔牧師及其同案人員的證據有疑問的。

不過，我們知道在重審時所有與“利用封建迷信組織破壞法治”有關的指控都被取消，其結果是對龔的四名同案人員的刑事控告被撤銷，對所有其他同案人員的判決

---

<sup>102</sup> “農村婦女三次被判死刑 陝西又見‘槍下留人’案”，原載于《北京青年報》。參閱中文網站：[www.southcn.com](http://www.southcn.com)，2003 年 5 月 11 日。

也大大減輕。然而，那四名被撤銷刑事指控的婦女在被送去勞動改造之前提供證詞證明當局對她們行刑，逼迫她們提供不利於龔牧師的證詞。<sup>103</sup> 對龔的判決由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罪名是強姦和傷害。初審時還有四人被判死刑，這次兩人改判為無期徒刑，另兩人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sup>104</sup>

中國政府從未作出任何官方解釋，說明為什麼在對龔的重審時取消了“利用封建迷信組織破壞法治”的控告。然而，觀察家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在案件重審兩周後，江澤民將最後一次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訪問美國。以與宗教活動有關的指控判處龔和三名同案死刑，或許會將人權問題和宗教自由問題在華盛頓—北京會談議程上提到中國政府官員不願意看到的地位。<sup>105</sup>

## 6· 最高人民法院對死刑的審核和批准

1996 年的《刑事訴訟法》第 189 條第 1 款規定：“如果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抗訴，維持原判。”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 199 條規定：一旦死刑上訴被駁回，“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然而多年以來，各種法規及其修正案已將某些案件的判決核准權從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到各省高級人民法院。

1979 年《刑事訴訟法》規定死刑核准權歸最高人民法院所有，但幾個月後，在 1980 年 2 月<sup>106</sup>就出現判決核准權的下放問題。

1983 年第一次開展全國範圍內的嚴打，各地各級法院大批死刑判決湧入最高人民法院等待核准，使其無法招架。同年，最高院下發通知，就殺人、強姦、爆炸及其他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和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將死刑核准權下放到各省級高院。<sup>107</sup>（1979 年的《人民法院組織法》也做了相應修訂，使死刑核准權下放合法化）。

1991 年至 1997 年間，最高法院將涉毒案件的死刑核准權下放到此類案件高發的六個省的省級高院。

1997 年，為了配合 96 年的嚴打以及修訂後頒佈的新《刑法》和《刑事訴訟

<sup>103</sup> “基督徒罪犯據報導身處險境之三”，HRIC2003 年 6 月 10 日。

<sup>104</sup> “中國撤銷對宗教頭目的死刑判決”，路透社 2002 年 10 月 10 日。

<sup>105</sup> “宗教頭目被處終身監禁”，《南華早報》2002 年 10 月 11 日。

<sup>106</sup> “死刑核准權誰來行使？”，郭光東著，原載於《南方週末》。參閱中文網站：[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2002 年 7 月 18 日。

<sup>107</sup> “有關將某些案件的死刑核准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1983 年。



法》，最高法院再次下發通知，將部分經濟案件的死刑核准權下放到省級高院，包括腐敗罪、行賄受賄罪以及其他“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行為。<sup>108</sup>

因此，最高法院自己下發的一系列通知實際上取代了 1996 年由全國人大起草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中死刑必須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規定。

有中國評論家認為，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62 條及 67 條的規定，即全國人大享有最高立法權。換言之，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或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能具有超越國家法律的效力。

2002 年，中國現行的死刑審核體系遭到置疑，起因是 2001 年 12 月 21 日判定的山西農民董偉殺人案。董偉在延安城某舞廳外打架致人死亡。他的律師隨後提起上訴，認為董殺人是出於正當防衛。報導此案的中國媒體大多支持該上訴要求，並指出受害人不止一次攻擊董身體在先，董防衛致人死命在後。<sup>109</sup> 陝西省高院在“復核”自己作出的死刑判決後，終審判決駁回上訴，並於 2002 年 4 月 22 日判決 4 月 29 日對董執行死刑。該判決並未通知董的律師，該律師于行刑前兩天主動去陝西省高院詢問上訴進展時才得知此判決結果。

隨後該律師自費前往北京，意圖當面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此案以暫緩行刑，卻被擋在最高法院的大門外，（據稱最高法院當天內部電話系統出現故障）。

行刑的當天早晨，該律師終於混入最高法院大樓，勸說一位法官重新審閱了該案的卷宗。該法官同意律師的看法，認為此案應該進一步審理才能最後下結論。隨後該法官用借來的手機與行刑現場取得聯繫，在距既定執行時間僅 4 分鐘時刀下留人。<sup>110</sup>（後陝西省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敦促下對該案重新審核，仍維持原判，董於 2002 年 9 月 5 日被執行槍決。）

董偉一案上訴的申請由省高院經非公開聽審、復核並最終維持原判，有鑒於此，中國法律界 5 位專家認為：“現行死刑復核程式的名存實亡，是本案暴露出來的最大問題。”<sup>111</sup>

<sup>108</sup> 《有關將某些案件的死刑核准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1997 年。

<sup>109</sup> 見“法治社會之大不幸”，參閱網站：[www.lawyer-group.com](http://www.lawyer-group.com) 未標日期

<sup>110</sup> 詳細報導及評論見“從‘槍下留人’到‘法下留人’”，陳興良著，《中外法學》Vol.15, No.1 (2003) 98-106 頁；“‘槍下留人’主角于昨日伏法”，原載於《北京晚報》，讀者可參閱（中文）網站：[www.ben.com.cn](http://www.ben.com.cn) 2002 年 9 月 6 日。

<sup>111</sup> “死刑核准權誰來行使？”，郭光東著，原載於《南方週末》，參閱網站：[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 2002 年 7 月 18 日。這五位學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興良、陳瑞華和賀衛方、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陳衛東及政法大學的樊崇義。

2004 年 1 月，美國媒體發文稱中國政府高層正醞釀司法改革，將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所有。<sup>112</sup> 國際特赦組織據國內可靠渠道得知，儘管某些高層官員從中阻撓，但死刑復核收歸最高法院之舉仍可望於 2005 年到位。消息人士相信，待該制度恢復以後，中國的死刑判決極有可能大幅度減少，這將因為復核系統得以按原定初衷方式運行，而非如目前的各自為政、缺乏一致性、地方利益高於法律規定的局面。他同時認為，一旦司法能夠擺脫地方政府及黨委的干擾，死刑數量有望進一步下降。

據媒體報導，2004 年 3 月 10 日，最高法院院長肖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正考慮收回死刑核准權。”他是在北京的人大分組討論會上作以上表示的，經中央媒體轉載，增加了可信度和權威感，但肖揚並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sup>113</sup>

消息人士又稱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比中級或省級法院的同行在理解國際人權標準方面有更高的造詣。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國法律沒有規定法官量刑時需參照國際法，至少在刑事案件的司法實踐中無此（參照國際法）先例。

在洛桑頓珠和丹增德勒的案件中，無論是依照中國法律還是國際法，該案的死刑復核過程都極為蹣跚。

官方稱洛桑頓珠未就其 2002 年 12 月 2 日下達的死刑判決提起上訴，而丹增德勒卻就自己的死緩判決提起上訴。<sup>114</sup> 但法新社最初報導中援引了一位元法庭工作人員的話，認為二人都曾提起上訴。<sup>115</sup> 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否洛桑頓珠被剝奪了向上級司法機構上訴的權利。

如事實確實如官方所說，洛桑頓珠放棄提起上訴的權利，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200 條之規定，此案“……應當由高級人民法院復核後，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此外，1997 年最高法院的通知雖將某些死刑復核權下放到省級法院，但同時也明確規定凡“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應提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sup>116</sup>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理應復核洛桑頓珠和丹增德勒一案。

<sup>112</sup> “中國緩和嚴酷刑罰之舉動”，《華盛頓郵報》2004 年 1 月 18 日。

<sup>113</sup> “中國最高法院可能限制死刑”，路透社 2004 年 3 月 10 日。

<sup>114</sup> “天府廣場放炸彈 阿安紮西和洛讓鄧珠判死刑”，參閱（中文）網站: [www.tfol.com](http://www.tfol.com) 2003 年 1 月 26 日

<sup>115</sup> “兩名定罪西藏分裂分子就死刑判決進行上訴”，法新社 2003 年 12 月 13 日

<sup>116</sup> 見註腳 107。

---

## 38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2002 年 12 月中旬，最高法院的官員在北京會見美國負責民主、人權及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Lorne Craner 時，反復強調將慎重復核該案。歐盟官員也得到類似的保證。<sup>117</sup>

因此，當 2003 年 1 月 26 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二人上訴請求時，輿論普遍認為該案將提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2003 年 1 月 26 日，也就是他的上訴請求被四川省高院駁回當日起，他的兩年死刑緩刑期開始。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210 條第 2 款之規定，他只要在緩刑期間（截止 2004 年 1 月 25 日）“不故意犯罪”，則應減為無期徒刑。否則將執行死刑。

丹增德勒的上訴請求被駁回數小時內，洛桑頓珠就被執行死刑。作為丹增德勒被控罪行的主要證人及同謀，他的死意味著任何企圖扭轉丹增德勒案件的申訴都極有可能以失敗告終。<sup>118</sup>

### 7. 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終“審判監督”

《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現“判決錯誤”時，即使終審判決已經生效，也有權重審或發回下級法院重審。據報導這一“審判監督”權在 2003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首次在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中使用，其目的不是為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不為防止侵犯人權（如刑訊逼供）的行為，而是為了顯示政府打擊犯罪的鐵腕。

在一次案例裁決中，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不能排除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存在刑訊逼供情況”為由，將一起案件由死刑改判為死緩。最高人民法院重審後，基於“重審期間的證詞”認為“‘刑訊逼供’的證據不足以推翻原死刑判決”，並下令死刑立即執行。<sup>119</sup>

該案主犯劉湧是遼寧省瀋陽市人大代表、頗有地位的富有企業家，被控組織實施黑社會性質的團夥犯罪，還涉及政府高層腐敗醜聞，並導致瀋陽市原副市長被判死刑。而此前對劉的調查和指控都被他有權有勢的親友化解了。

劉湧於 2000 年 7 月企圖逃往俄羅斯時被拘留，6 個月之後才正式被逮捕。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於 2002 年 4 月 17 日判決劉湧 32 項罪名成立，計有偷稅漏稅、侵犯人

---

<sup>117</sup> 洛桑頓珠和丹增德勒一案—法律、法院及合法性之辯論，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參閱網站：[www.cecc.gov](http://www.cecc.gov)，2003 年 2 月 10 日。

<sup>118</sup> 同上。

<sup>119</sup> 最高人民法院裁決全文（中文）見：[www.dffy.com/sifashijian/ws/200312/20031223202412-3.htm](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ws/200312/20031223202412-3.htm)

身、非法擁有武器、敲詐勒索、綁架等，其中包括下令謀殺一名未經他同意擅自經營煙草的攤主。他因該謀殺罪被判處死刑，因其他罪名判入獄監禁，並處罰金共計人民幣 1500 萬元（合 180 萬美元）。

劉的律師于 2003 年 8 月 15 日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並提交 8 位在職及退休獄警的證詞，稱其目睹劉在刑訊逼供後被迫承認自己組織殺人。另外，被控參與殺害煙攤攤主的 8 人中只有一人承認劉曾指使他殺人。

劉湧由死刑改判為死緩在國內媒體掀起軒然大波，一時間網上紛紛流傳遼寧高院法官收受劉湧的賄賂，輿論矛頭直指中央反腐倡廉的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3 年 12 月作出死刑判決之後，劉湧立即被押赴法庭附近火葬場旁的流動行刑室接受注射死刑。

評論家稱當時中央政法委員會認為遼寧高院僅因為有刑訊逼供嫌疑就將死刑改判為死緩不妥，不能開這個先例，於是置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其他法律專家的意見于不顧，毅然下令重審。<sup>120</sup>

## 8. 死刑的執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死刑是用“槍決”的方式執行的。在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經修訂之後，也允許通過注射來執行死刑。

《刑事訴訟法》第 211 條規定：“下級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執行死刑的命令後，應當在七日以內交付執行。”然而如上所述，與第 211 條相矛盾的是，實際上中國有大部分死刑並不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就能執行，只要省級法院同意，一個中級法院就可以執行死刑。

一經宣判，死刑常在被判刑人上訴失敗後幾分鐘或幾小時內執行，比如洛桑頓珠案件就是這樣。而有些罪犯則被關押在某處，直到執行之日，他們也許要等上一周（根據第 211 條），如果當局安排在某個重要日子進行集體處決，他們也許就要等上更長一段時間，比如為紀念世界禁毒日而把大批罪犯留到六月底處決，這意味著為了一個“恰當”的處決時間，有些罪犯將會等上好幾個月。<sup>121</sup>

(photo caption)

<sup>120</sup> “死刑的實施顯示黨對中國的統治”，《華盛頓郵報》2003 年 12 月 23 日。

<sup>121</sup> 據國際特赦組織初步統計，2003 年 6 月 26 日之前的一周內，中國執行了 54 個與毒品相關的死刑判決。



---

## 40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員警為一名剛判處極刑的罪犯系上衣扣以禦寒風，這也許是十惡不赦的罪犯最後體驗到的一點人間溫暖。

國際特赦組織注意到中國有些法院已經採取一些措施來緩解等候處決的囚犯的痛苦，例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 2003 年 9 月要求市內所有中級法院必須為罪犯另設房間，以供其與家屬見最後一面。據有關報導，2003 年 4 月被指控犯有謀殺罪的市場攤主李軍，獲准在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看守所內一間這樣的房間裏與其妻子見面 15 分鐘，看守（和一名記者）也在場，兩人分坐隔牆的兩側，通過電話線以及加厚玻璃交談，該房間被稱為高級法院“人文關懷”的體現。<sup>122</sup> 在其他地方，有報導反復形容法院不准家屬與死刑犯見面，甚至不通知家屬上訴失敗的最後結果就執行死刑。

在中國，囚犯的利益在審判和執行死刑的過程中常遭忽略，反而是法院和審判員的強硬手段以及他們滿足黨和國家之要求的責任心得較多反映。

例如在宣佈死刑判決時，被判刑人在法庭公眾席前排成一行，有時一些照相機和電視攝像鏡頭會對準他們的臉，記錄他們在聽到宣判時的表情，一些報導諸如有關毒品、犯罪團夥以及官員腐敗等特殊案例的專欄記錄片常會公開播放這些鏡頭。

儘管 1998 年頒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禁止遊街示眾或者其他有辱被執行人人格的行為”，但是，死刑宣判後，這些死刑犯仍然會被示眾。囚犯通常在脖子上吊一塊畫著個大紅叉的姓名牌，由人民武裝員警押送，坐上一輛敞蓬卡車，穿過繁忙的街道到達行刑地。

2000 年 5 月，中國政府代表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彙報說：“中國禁止遊街示眾，禁止在罪犯身上懸掛寫有其姓名的大標語，或用繩索捆綁罪犯。各級人民法院已做了大量工作來減少並杜絕這種行為，目前該現象已經不復存在，一旦在個別地方出現，我們將根據法律嚴肅對待。”<sup>123</sup>

### 8.1 槍決

以下有關槍決的描述包含一些非官方內容，很難說是否可靠，但這些內容與國際特赦組織近年來收到的大量報告是一致的。

大多數報告描述在行刑的前一晚，罪犯可以點菜盡情吃一頓最後的晚餐，可以

---

<sup>122</sup> 《北京死刑犯首次會見家屬，體現法院人文關懷》，參閱 2003 年 9 月 18 日 [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中文），該報導沒有提及李軍被處決的日期。

<sup>123</sup> 參閱：《酷刑－中國一種日漸擴大的懲罰：該行動了》國際特赦組織 2001 年 3 月。（AI Index: ASA 17/004/2001）。

隨便吸煙，但不准喝酒，有些報告還說罪犯可以沖淋浴，換衣服。

行刑當天的早晨，法庭官員以及員警來到罪犯的牢房，向其宣讀審判檔，罪犯如果本來沒有帶手銬腳鐐的話，此時就會帶上，然後由法警、武警以及其他一些包括判官在內的法庭官員押往刑場。

有報告說，人群有時會跟隨押送罪犯的敞蓬卡車到刑場去。<sup>124</sup> 如果是個別罪犯，法院常會使用法院車輛來押送，據一些報告形容，這些車輛非常隱秘，毫不顯眼，不會在行車途中引起民眾注意或警覺。<sup>125</sup>

一些監獄內部設有刑場，死刑犯從牢房到刑場的距離很短。在獄中行刑顯然沒有標準的法規做依據。一位自稱是監獄官員的人在網上法律論壇中稱，在幾次目睹行刑後，發現行刑過程中有自相矛盾以及令人懷疑的地方：

“（執行死刑的）許多方面都缺乏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譬如，駐獄武警是否可以執行死刑？如果可以，應該怎樣確定行刑的具體人選？監獄是否可以將死刑犯押赴刑場在執行死刑前對全獄囚犯示眾、並利用其作現場法律教育的典型？如果可以，需要履行哪些法律手續以明確相關責任？死刑犯在刑場上是否允許發表演說？死刑犯在會場示眾的時間是多久？監獄是否一定要給死刑犯提供最後的一餐？這個最後的一餐的供應標準又是怎樣的？監獄是否允許死刑犯在行刑前洗澡？監獄是否應該給死刑犯提供寫遺書的紙筆？死刑犯的遺書又應該通過怎樣的程式傳遞到遺書接受人的手中？執行死刑的時候群眾觀看應該遵守哪些規定？”<sup>126</sup>

眾所周知，中國一些城市不僅在監獄裏有刑場，在其管轄範圍以內，還有永久性的行刑場地，而其他城市則明顯不是這樣，一份河南省鄭州市的行刑報告顯示，要在該市內找一個合適的刑場是相當困難的，法警被派到市郊去搜尋，最好是距離較近，卻離主要幹道較遠，寬敞，又要隱秘，而且有天然屏障，可以阻擋流彈。<sup>127</sup>

一名未署名的法警說：“我曾經特別滿意一個刑場，但只使用了兩次就被當地群眾用磚砌起來了，這等於是被破壞掉了。”<sup>128</sup>

<sup>124</sup> 《目睹一次死刑執行》，作者任評，（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無日期。

<sup>125</sup> 《中國的死刑是如何執行的？》，（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無日期。

<sup>126</sup> 《應該制定一部完善的〈死刑執行程式法〉》，作者鄧清波，一個網上法律論壇“法網天壇”的貼稿人，2003年4月29日。該作者貼此稿是受感於一篇新聞報導，講述為拍一張集體照，一名罪犯獲准與其直系親屬交談，作者認為這種行為以及其他一些手段並沒有法律依據。（此稿已從網上刪除。）

<sup>127</sup> 《中國的死刑是如何執行的？》，（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無日期。

<sup>128</sup> 同上。

---

## 42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國際特赦組織從 1998 年以來，沒有在中國收集到公開行刑的報導。不過公眾確實參加了一些死刑的執行，有些甚至不需經過員警或其他權力機構的“籌畫發動”，路人或跟隨押送罪犯的敞蓬卡車前來的人群，總能占到一個有利地形，觀察刑場上的行刑過程。<sup>129</sup>

大多數報告形容，罪犯被強制雙膝跪地，雙手反綁在背後，一名人民武裝員警充當“槍決員”，用大口徑手槍近距離打出一發子彈，通常直接射入罪犯的後腦。

如有多名罪犯要處決，所有罪犯並排排成一行，每人背後站一名手持步槍的人民武裝員警，等指揮官發出命令後同時開槍。<sup>130</sup>

不過也有輪流處決的情況發生，必須等前面一批罪犯槍斃完了之後才輪到下一批，下一批罪犯也因此目睹了處決的過程。例如，2001 年 11 月 6 日，在北京槍斃了 18 名罪犯，相關報導指出其中 10 人是在 15 分鐘的時間內處決完畢的。<sup>131</sup>

一份報告說，萬一發子彈未能立即斃命，另一名人民武警會上前給罪犯補一槍<sup>132</sup>。一位死刑目擊者曾寫道，有一個罪犯中槍後足足過了 5 分鐘還沒有立即死亡，人民武警的指揮官才命令對該罪犯再開一次槍，結果還是未能斃命，兩名武警就上前踢罪犯，直至其死亡。<sup>133</sup>

一旦法院驗屍官確認罪犯已死亡，並拍照存檔後，屍體就會送到諸如當地診所或醫院等醫療機構的陳屍房裏，或者送到監獄內部的陳屍房裏。

### 8.2 注射死刑

1997 年《刑事訴訟法》允許使用注射的方法執行死刑。據報導，雲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於 1997 年 3 月 28 日通過注射對兩名罪犯執行死刑，成為中國使用這種方法的第一個法院。從那時起，到 2003 年 3 月 1 日止，僅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這一個法院（該省總共有 18 個中級人民法院），就用注射死刑法處決了 112 名罪犯，平均每月 3 名。<sup>134</sup>

注射並沒有緩和人們對死刑的根本抵制態度，這種處決方式仍然侵害了個人的

---

<sup>129</sup> 《目睹一次死刑執行》，作者任評，（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無日期。

<sup>130</sup> 同上。

<sup>131</sup> 《冒充員警橫衝直撞，罪犯在北京被處決》，法新社 2001 年 11 月 9 日。

<sup>132</sup> 《中國的死刑是如何執行的？》，（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無日期。

<sup>133</sup> 《目睹一次死刑執行》，作者任評，（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無日期。

<sup>134</sup> 《雲南全面推廣注射死刑法執行制度向文明發展》，（中文）參閱：[www.xinhua.org](http://www.xinhua.org) 2003 年 3 月 1 日。

生命權，而且，對一名囚犯來說，無論其有罪還是無辜，被束縛在極端惡劣環境中的同時，還要接受國家剝奪其生命的判罰，迎接死亡的來臨，心理上飽受折磨，這一切仍然是殘酷的、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一個國家提倡使用“人道主義”方式執行死刑，並不表示該國就是一個“文明”社會。

注射死刑法，很快在全中國一個接一個省的法院裏傳播開來，官方報告稱之為中國的“科學化”以及“文明化發展”<sup>135</sup>。媒體對有記者或官員觀看的處決作報導時，也總是重複這一點：“所有在場的人員都認為注射是一種非常文明科學的死刑執行手段。”<sup>126</sup> 但中國並不準備用注射來完全代替槍決。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曾說過，儘管注射已經被廣泛使用，但槍決仍然會繼續存在。<sup>137</sup>

沈副院長補充說，最高人民法院已指示中國醫學科學院研製用於注射死刑的藥物。中國也是成員國之一的世界醫學會早已做出如下決議：“……醫生以任何方式參與死刑的執行，或涉及處決過程的任何一個步驟，都是不道德的。”<sup>138</sup> 但中國的醫生明顯參與死刑藥物的研製過程，而且不管槍決還是注射，法院驗屍官也都在場。

據報導，研製死刑藥物需要做動物實驗，先是小鼠，然後是大鼠、狗，最後是猴子。<sup>139</sup> 注射人員拿兔子做練習，學會如何在罪犯手臂上找到靜脈。<sup>140</sup> 中國使用的藥物大概和美國用於注射死刑的藥物相類似，是一種麻醉混合劑（如噴妥撒），含有肌肉麻醉劑（如巴夫龍溴）和停止心跳的藥劑（如氯化鉀）。巴夫龍溴麻醉死囚的隔膜，使其停止呼吸，而氯化鉀截斷人體傳送到心臟的電子信號，導致罪犯死亡。

2003 年 3 月 1 日，雲南省宣佈全省將全部使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sup>141</sup> 作為中國執行注射死刑的先驅，雲南省於 2003 年 3 月投資建造了 18 輛注射死刑執行專用車，可以對邊遠地區（以及很難找到合適的槍決刑場的人口密集地區）的死刑犯執行死刑。<sup>142</sup> 200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敦促全國各級法院購買死刑專用車：“……可以在

<sup>135</sup> 同上。

<sup>126</sup> 《死囚在飄忽中受死，雲南法官講述首例注射死刑過程》，（中文）參閱：[www.sina.com](http://www.sina.com) 2001 年 9 月 18 日。

<sup>137</sup> “注射成為死刑執行手段”，南華早報 2000 年 9 月 1 日。

<sup>138</sup> 1981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召開的第 34 屆世界醫學會通過；2000 年 10 月，在蘇格蘭愛丁堡召開的第 52 屆世界醫學會大會修改。參閱：[www.wma.net](http://www.wma.net)

<sup>139</sup> 《遼寧執行首例注射死刑 5 大具體行刑細節被揭開》，（中文）參閱：[www.china.org.cn](http://www.china.org.cn) 2001 年 11 月 21 日。

<sup>140</sup> “注射成為死刑執行手段”，南華早報 2000 年 9 月 1 日。

<sup>141</sup> 《中國各省規定使用注射死刑方法》，新華社，2003 年 3 月 1 日（英國廣播電臺，週一，Alert ASI AsPol sg）。

<sup>142</sup> “死亡，雲南的風格”，《今日北京》，參閱：[www.bjtoday.ynet.com](http://www.bjtoday.ynet.com) 2003 年 3 月 7 日；也參閱第 2 頁。



---

44 “依法”執行？ - 死刑在中國

---

判刑之後立即執行死刑”。<sup>143</sup>

詳細描述注射死刑的新聞報導比槍決的報導常見得多，顯然是因為注射死刑是一種“社會進步”，值得表揚，而且在中國仍算是“新”方法<sup>144</sup>。另一個常在中國有關注射死刑的官方媒體中提及的理由，就是美國也在使用這種方法。

2003 年 3 月，一份關於法警如何參與注射死刑的報告出臺，報告中說雲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隊被分成五個小組：內圍警戒組、週邊警戒組、執行第一組、執行第二組和押解組。週邊警戒組負責清理注射死刑執行專用車停靠點的周圍地區，內圍警戒組站在專用車四周附近的位置看守。而根據死刑執行的報告，執行小組到監獄的蓬車裏，“……熟練地捆綁”<sup>145</sup>了當天要處決的兩名罪犯中的一名，將其送入死刑專用車。

2003 年 1 月 17 日，甘肅省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用注射死刑法處決了 11 名罪犯，為蘭州市第四批用該方法執行死刑的罪犯。一位《蘭州晨報》的記者，與幾十位來自該省各級法院的代表一起，應邀觀看了此次注射死刑的執行。刑場設在蘭州偏遠郊區一個秘密的看守所裏，目擊者被分成九組，在兩個不同的房間觀看執行死刑。記者觀看了當天最後一名罪犯董軍的處決過程，該罪犯因搶劫罪被判處死刑：

“董軍被帶進來時已經脫去腳鐐，顯得神態安然，面部不帶任何表情。在執行人員的指示下，董軍主動上了執行床，將手從一圓洞中伸到單向玻璃的另一面。專業工作人員迅速在董軍的手臂上插針，將血管與注射泵連到一起。執行人員啟動注射泵，注射工作開始。董軍閉上雙眼，沒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一分鐘左右，電腦顯示董軍已經腦死亡，腦電圖拉成一條直線，心臟跳動也慢慢減緩，直至心臟停止跳動。”<sup>146</sup>

另一份報告指出，罪犯先被注射一種普通麻醉劑，使其昏迷，然後才注射死刑藥劑。<sup>147</sup>美國通常也是如此，第一步先給罪犯上麻醉藥，使用如巴比妥鈉之類作用快速的藥物。

關於藥物需要作用多長時間才會導致死亡的問題，各種報告眾說紛紜。有些報

---

<sup>143</sup> 《中國法院購買流動行刑室》，法新社 2003 年 12 月 18 日。

<sup>144</sup> 《全國推行注射死刑》，參閱 [www.sina.com.cn](http://www.sina.com.cn)，2001 年 9 月 14 日。

<sup>145</sup>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隊執行注射死刑》，（中文）參閱：[www.yn.xinhuanet.com](http://www.yn.xinhuanet.com) 2003 年 3 月 16 日。

<sup>146</sup> 《蘭州 11 名罪犯昨被執行注射死刑行刑過程目擊》，（中文）參閱：[www.jcrb.com](http://www.jcrb.com) 2003 年 1 月 18 日。

<sup>147</sup> 《特寫：注射死刑全面揭秘》，（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2001 年 10 月 24 日。

告說需要 2 分 50 秒<sup>148</sup>；有些說觀察到的處決表明需要 35 到 50 秒的時間。<sup>149</sup>而罪犯的基本健康狀況，及其身體密度與注射的藥劑量之間的對比，才是導致從注射到臨床死亡所需時間長短不一的不確定因素。

然而在其他地區的觀察證明，注射死刑會延長痛苦折磨，死亡也遠非是迅即有效的。例如，瓜地馬拉執行第一次注射死刑時，由於插針人員過分緊張，整個過程所用的時間比預計的時間長得多，結果對罪犯、及其獲准觀看行刑的妻子孩子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還有一點，如何才能找到一根合適的靜脈？尤其對靜脈注射的吸毒犯來說，頻繁的注射已經損壞了他們的靜脈，這就更成問題。在美國，醫生有時不得不尋找其他體表注射點，比如從手上注射，或從腹股溝注射，醫生也曾不得不在吸毒的死刑犯身上開很深的切口，從而找到一條可以插針的靜脈。<sup>150</sup>

也曾有過這樣的醫療紀錄，巴比妥納麻醉劑在手術尚未完成前就已結束功效，結果病人在手術過程中清醒過來，對醫生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清楚明瞭，可就是無法動彈，也無法做出手勢，告訴醫生自己所受的痛楚。行刑過程中，停止麻醉但身體仍然癱瘓的罪犯也會清醒過來，感覺到痛楚，卻又無法表達。<sup>151</sup>迄今為止，尚未有明確的證據證明注射死刑會造成此類情況，但美國已因為這種可能性而出現訴訟。<sup>152</sup>

## 9. 器官收用

中國死刑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在行刑後摘取並買賣人體器官，這種行為違反了世界衛生組織關於摘取與移植人體器官的規定，<sup>153</sup>而且，器官移植醫生參與這種過程，也破壞了國際移植學會和世界醫學會的道德準則。<sup>154</sup>這些規定準則都是在 1991 年，經過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成員國投票通過的。

<sup>148</sup> 《注射死刑曾是法院絕密課題》，（中文）參閱：[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 2001 年 9 月 25 日。

<sup>149</sup> 《特寫：注射死刑全面揭秘》，（中文）參閱：[www.chinamonitor.org](http://www.chinamonitor.org) 2001 年 10 月 24 日。

<sup>150</sup> 參閱：*Post-Furman botched executions*，作者 Michael L. Radelet，科羅拉多大學：

<sup>151</sup> 參閱《對美國北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分區地方法院禁止令救濟和宣言判決的控訴》，見 *Fugate* 訴懲教部和 *Jim Wetherington* 案例，[www.schr.org/news/docs/fugate\\_complaint.pdf](http://www.schr.org/news/docs/fugate_complaint.pdf) 2002 年 8 月 12 日。（該控訴被呈上法庭，內附心臟麻醉藥師醫學碩士 Mark Heath，以及佐治亞大學醫藥學院教授醫學博士 Randall L. Tackett 的陳述。）

<sup>152</sup> 參閱：Abu-Ali Abdur'Rahman 訴 Don Sundquist 等人的案件（No.02-2236-III），田納西州第 20 司法區大衛森縣民事法庭（上訴被駁回，裁決見：[www.tsc.state.tn.us/opinions/tsc/capcases/rahman/06022003/ruling.pdf](http://www.tsc.state.tn.us/opinions/tsc/capcases/rahman/06022003/ruling.pdf)）

<sup>153</sup> 《人體器官移植指導原則》，世界衛生組織，參閱：[www.who.int](http://www.who.int) 1991。

<sup>154</sup> 《政策報告：器官移植協會的倫理》，器官移植協會，參閱：[www.transplantation-soc.org](http://www.transplantation-soc.org)。其中包括器官移植協會成員不得參與摘取或移植死刑犯的器官的規定。2002 年協會又重申這一立場：“器官移植協會重申反對出售器官。”新聞稿，2002 年 8 月 30 日。也參閱世界醫學會，《世界醫學會關於人體器官組織捐獻移植的聲明》，作者 Ferney Voltaire，2000 年，見：[www.wma.net](http://www.wma.net)



國際特赦組織 1993 年報告了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情況，並當即要求中國政府在沒有告知相關死囚並得到其自願同意的情況下，杜絕這種行為。<sup>155</sup>1995 年，該組織又報告：“……據報導，使用死囚器官的行為，在中國仍然非常普遍”，<sup>156</sup>還引用一份檔的內容，說中國用於移植的器官，有 90% 來自死刑犯。<sup>157</sup>人權觀察於 1994 年刊登的有關文章列出了這種行為的確鑿證據<sup>158</sup>，其中還包括一篇針對該情況的政府法令全文。<sup>159</sup>

最近二十年來，使用死囚器官的系列報告持續不斷，有關這種行為的醫學文獻也層出不窮，<sup>160</sup>例如，1999 年，卡梅隆（Cameron）和霍芬伯格（Hoffenberg）引用雷石立（音譯）教授對他們說的話：1996 年有 3200 個腎臟來自於 1600 名死刑犯。<sup>161</sup>

2001 年，紐約市的《村聲》雜誌報導了美國器官移植醫生湯姆斯·蒂夫羅的經歷，醫生說他在中國看見過病人移植腎臟。他的經歷以及病人的證明，都使他肯定這些器官來自中國的死刑犯。<sup>162</sup>

2001 年 4 月，中國江西省一份週報刊登一篇文章，報導死刑犯傅欣榮（音譯）的家屬準備起訴當局，因為 2000 年該罪犯處決之後，其器官遭非法出售。<sup>163</sup>

2001 年 6 月 27 日，王國琦（音譯）醫生向美國國會國際關係和人權附屬委員會作證，他在中國行醫期間，曾經從 100 多名死刑犯身上摘除過器官，其中主要為皮膚、腎臟以及眼角膜。王醫生還證明，員警和醫療組織也一起配合，死刑執行完畢

<sup>155</sup> 《中國：受害者數以千計：1992 年死刑》，AI Index：ASA 17/09/93。器官移植與死刑之間的密切關聯，對給囚犯注射藥劑的道德行為以及死刑的改革都產生影響，這正是引起國際特赦組織關注的原因。囚犯在極富壓力的環境中同意捐獻器官，促使許多醫學團體將其同意程度限制為一種尺度，用來衡量人們在道德上對囚犯參與器官移植過程的接受程度。

<sup>156</sup> 《中國：醫學方面：使用死囚犯的器官》，AI Index：ASA 17/01/95，1995 年 3 月。

<sup>157</sup> “關於使用死囚犯的器官”，作者 RD Guttman，《器官移植評論》，1992 年，第 6 期：189-193 頁。

<sup>158</sup> 《中國：中國的器官購取與死刑》，人權觀察，1994 年 8 月，見：[www.hrw.org](http://www.hrw.org)

<sup>159</sup> 參閱：《關於利用死罪犯屍體與器官的暫行規定》，1984 年 10 月 9 日，出處同上，附錄 2。

<sup>160</sup> 例如參閱：“中國使用死囚犯的器官”，作者 JD Briggs，《腎學、透析、移植》，1996 年，第 11 期：238-240 頁。

<sup>161</sup> “器官移植倫理的重思：有償器官捐獻與死囚犯當捐獻人”，作者 JS Cameron 和 R Hoffenberg，《國際腎臟》，1999 年，第 55 期：724-732 頁。

<sup>162</sup> “中國的處決公司”，《村聲》，見：[www.villagevoice.com](http://www.villagevoice.com) 2001 年 5 月 2-8 日。

<sup>163</sup> “少有中文報紙揭發摘取罪犯器官的細節”，華盛頓郵報，2001 年 7 月 31 日。路透社報導，該故事登出 2 天後，一名參與報導的記者在“一個月前”被解職。參閱《中國報界解雇報導器官交易的記者》，路透社，2001 年 8 月 2 日。

時，病人的術前準備也做好了。<sup>164</sup>

2004 年 1 月，武漢市永濟醫院的器官捐獻研究會會長陳忠華（音譯）教授講到死刑犯時說：“未經允許摘除這些器官，是中國醫療歷史上的一個污點。”<sup>165</sup>

據報導，行刑的方式還會爲了保護要摘取的器官而改變，比如，如果要摘取罪犯的眼角膜，槍決人員爲避免損傷眼睛，會把子彈射入罪犯的頸部或心臟。<sup>166</sup>

中國政府和媒體對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事件，大致上保持沈默，但還是出現了一些變化的跡象。2003 年 10 月 1 日，廣東省深圳市制定法律，規定器官移植只能由紅十字協會管理實施，病人或其家屬必須有書面同意，或者向兩名醫生表示口頭同意後，才可以在病人死亡後使用其器官。<sup>167</sup> 據報導，這是中國的第一部相關法規，旨在減少器官的非法交易，比如有人在英特網上或在醫院裏登廣告出售腎臟。<sup>168</sup> 但是，深圳的這部法規沒有包括等待處決的罪犯。

## 結論與建議

國際特赦組織的記錄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處以死刑的人數仍然比世界上其餘國家處決人數的總和還要多。

中國的死罪嫌疑犯從開始直至被處決的整個法律程式中，其基本人權遭到多次侵犯。這些侵權行爲不僅違反了國際公約，其中包括對中國政府有約束力的國際公約，而且也違反了中國本國的法律規定。

然而，即使中國完全按照本國現定的法律行事，這些法律與國際標準之間的差距，仍然會給侵犯人權的繼續存在留下餘地。而且，即使中國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準備完全與國際標準相接軌，但其司法體系上的結構鬆散、帶有太多政治色彩、缺乏資金等現象，仍然會毫無疑問地使侵權行爲繼續存在下去。2003 年 1 月，在中國偏遠地區，一名少年犯被判處死刑，但中國法律明文規定禁止處死少年犯，而且中國已經批准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這個案例就是對以上論斷的最

<sup>164</sup> “醫生證實中國使用囚犯的器官”，《英國醫學雜誌》，2001 年，323：69，見 [www.bmj.com](http://www.bmj.com) 2001 年 7 月 14 日。

<sup>165</sup> 《上海設法控制器官的非法交易》，南華早報，2004 年 1 月 17 日。

<sup>166</sup> 例如參閱：《地獄的十八層——來自中國古拉格的故事》，作者 Kate Saunders 和 Cassel，倫敦，1996 年，第 48 頁。

<sup>167</sup> “中國城市視人體器官出售爲違法”，載於 2003 年的《英國醫學雜誌》；327：520，也可參閱 2003 年 9 月 6 日的下列網頁：[www.bmj.com](http://www.bmj.com)

<sup>168</sup> “上海設法控制器官的非法交易”，《南華早報》，2004 年 1 月 17 日。

好證明。

國際特赦組織認識到，為制定沒有漏洞的法律法規來防止誤判錯判，進行法律和體制改革，會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看到本文提到的案例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法律體制中驚人的失誤，國際特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立刻停止死刑的執行，朝最終廢除死刑的目標邁出第一步。這也是中國政府向各國政府反復申明要達到的目標。

國際特赦組織堅持認為，死刑是對法律公正的根本違反；沒有公正的死刑堪稱為人類文明的一種最終失敗。

## 建議

### 一，對國際標準以及法律的一般性建議

- 1 以徹底廢除死刑為目標，中國立刻停止死刑的執行；
- 2 廢除死刑的第二步是按照國際標準縮小死罪的範圍；
- 3 儘量立即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4 儘量立即批准《禁止酷刑公約》的任擇議定書，允許國內以及國際機構對拘留看守所作定期檢視；
- 5 徹底執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尤其禁止體罰以及遊街示眾，確保罪犯在拘留期間可以得到迅即的醫療照顧；
- 6 徹底執行《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尤其確保拘禁者可以選擇律師，而且與該律師之間有迅即、全面以及不受干擾的接觸。

### 二：關於法律改革方面的特別建議

- 7 為所有嫌疑人設立保障體制，確保其得到無罪推定的對待，包括獲得避免自我歸罪、保持沈默，以及雙方機會均等的權利；
- 8 一抓到嫌疑犯，就給員警發獎金、做宣傳或升職位的做法應立即停止，而須等到所有法律程式結束之後，才可以進行獎勵；
- 9 為切實履行《禁止酷刑公約》，中國應在《刑事訴訟法》中專門列出一條，明確禁止在法庭上使用刑訊逼供所得的證詞；
- 10 廢除法庭上的判決委員會，朝杜絕“先判後審”以及其他政治干擾審判的目標邁出切實的第一步；
- 11 集中力度，嚴禁對各類罪犯延長拘留時間或任意拘留；
- 12 為糾正中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錯誤，組織一個需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的調查委員會，專門負責調查包括本文提及案件在內的錯判誤判案件。